

老子大学主办

共产主义月刊



总第 74 期

2024 年 2 月立春号



《共产主义月刊》编委会

总顾问：

雷公 李政 唐仁义
黎鸣 石镓 神圣人
曾向东 华乔 泉头

总编辑：

朱云川 15998980906（重庆）
郭向锋 15193689604（庆阳）
宋心宽 18141905384（北京）
蒋郎兵 13983654902（重庆）

总编室：

共同主义 ABC
关山情 曹公渡 何泳飞
藏闲居 马文杰 熠之
肖月 蓝海浪花 海吟
王鹤云 清风明月 森帅
幸福人 谢国华 淼淼
富雪梅 仇景 彩虹
高正军 今生 吴子
智者说 张国群 何建军
赵华 肖起国 施晓渝

兴国网-老子大学

www.gczyabc.cn

QQ 投稿：241839300

实事求是 学术争鸣

道德自律 文责自负

本期责编：朱云川

【拯救马克思主义】

拯救世界，不如拯救马克思主义- 1 -

马克思主义，允许超越及如何才能超越- 2 -

附：【英雄帖】发起新旧文化四大战役- 3 -

教条主义，让人着迷却没用的形式主义- 4 -

朱云川：东方圣人说新马

一、马克思主义是从哪里来的- 5 -

二、共产主义等于马克思主义吗- 6 -

三、马列毛主义各有啥不同呢- 6 -

四、新时代清除三大社会公害- 7 -

圣人文化能不能改变社会和世界- 8 -

当今社会患大师饥渴症，有专家缺大师- 10 -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吃人秘密- 11 -

【反思的毛派】

纪念列宁：他的思想代表着未来 13

传统教科书：形而上学唯物主义 17

张维迎：“你说话注意点，小心点！” 19

“姓资姓社”，谁才是“通往奴役之路” 22

当代职场现形记，当今社会照妖镜

01 官僚主义的诅咒 26

02 悬浮 27

03 玩弄权术 28

04 目中无人 28

05 谁是社会的主人 29

【新共产主义】

朱云川著《党的出路》连载五

科学发展观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31

第一章 立国之本

一 独立自主 31

二 道德觉悟 33

三 自然人权 36

四 为政之本 40

五 主权在民 43

六 关心政治 47

【拯救马克思主义】

拯救世界，不如拯救马克思主义

我们要把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统一起来、同我们正在做的事情统一起来，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不为任何风险所惧，不为任何干扰所惑，始终坚守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不负共产党人的光荣称号。

与时代同步伐，与人民共命运，关注和回答时代和实践提出的重大课题，是马克思主义永葆生机活力的奥妙所在。我们要以科学的态度对待科学，以真理的精神追求真理，不断赋予马克思主义以新的时代内涵。[习近平：《深刻感悟和把握马克思主义真理力量》，载《新华网》，2018 年 4 月 24 日。]

马克思主义无疑是科学，如果不能以科学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结论也是错误的；共产主义无疑是真理，如果不能以真理的精神解放共产主义，结果也是荒谬的。

——朱云川著《文明自信》导言：共产主义现实运动

在网上，有人对当代圣贤朱老师说：

中华文明五千年，老子孔子与孙子，教化天下造人心，东方圣人出东方，敬天敬地敬神灵，宇宙循环日月行！人类进步见文明，世界大同地球村！

尊敬的朱老师您好，我们国家内忧外患，当前，世界混乱！您是圣人，请您救救人心，救救国家，救救世界，请您拿出治理安邦平天下的战略思想教化我们？千万不要拿古人孔子，老子，孙子，《西游记》来教化我们？谢谢老师，您的学生。

当代圣贤朱老师一并回复如下：

不要讲老子孔子孙子，不用讲马恩列毛邓习，不讲西游记鬼神故事，只讲朱老师的战略思想，人民这个要求视为圣人测试可以理解，但根本上是不合理的呀！

扪心自问，自许当代圣贤的朱老师，有没有堪称天下第一的学术成果，包括个人独特的战略思想，当然有！

比如，一个核心，共同主义，即共产主义 ABC；两个公式，老子+马克思=中国梦，道德经学习+共产主义=新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十六字诀：三位一体，本末有序，人民本位，道法自然。（更多略）

历史上，真正的战略思想，文字都是简单明了的，道理都很全面深刻的，操作都是简单管用的。比如，老子的道法自然（真实），孙子兵法的道天地将法，共产党宣言的消灭私有制，毛主席的打土豪分田地，朱老师的共产主义 ABC。

真正的战略思想，从来不是教化人民，而是针对当下现实问题的执行有力。比如，用共产主义 ABC 拯救马克思主义。

当今乱世，圣人拯救世界人心，摸门不着，大都是空谈；只有拯救马克思主义，解放共产主义，才是真抓实干。在这个伟大变革的新时代，我们要不要拯救马克思主义？能不能拯救马克思主义？怎么去拯救马克思主义？一切尽在共产主义 ABC！

#辨析科学与哲学# #关于哲学那些事# #真理如此简明# #中国哲学感悟#

马克思主义，允许超越及如何才能超越

当今世界，马克思主义陷入不正常低潮，三失三笑就是证明。与此同时，人类社会也开启战乱模式，陷入至暗时刻，这是黎明前的黑暗。

在这个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伟大巨变时代，中共中央适时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坚持双创二结合的新文化建设的大政方针，全面开启了新时代文化补天工程。

坚持真理，实事求是，守正创新，要创建属于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建立 21 世纪的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即新共产主义，党和国家鼓励创新马克思主义，就说明马克思主义在政治上是允许超越的。

坚持把政治和学术分开，鼓励和倡导开展积极健康的学术争鸣，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创造有利文化条件，理论创新的政治合法性问题解决了，学术理论上的合理性问题尚未解决。如何才能真正解决好这个问题呢？

当代圣贤朱老师指出，创新、拯救、超越马克思主义可分三步走：

其一，端正学术态度。坚持道在德先，三分三准。坚持真理指导社会实践，

即把学术与政治分开，以学术为准；把教科书与原著分开，以原著为准；把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分开，以共产主义为准。

其二，恢复本来面目。恢复马克思主义的学术、原著、共产主义三大特征，无论其对错，这是真马克思主义。据于苏联斯大林时代编写的传统教科书，充斥着不少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空想主义等非马克思恩格斯所赞成的错误观念，是典型的曲学阿世的旧马克思主义，或假马克思主义。

其三，坚持双重超越。就是说，要用真马克思主义超越假马克思主义，去伪存真；用新马克思主义超越旧马克思主义，守正创新。

大多数人并不明白，当今让世人不信的马克思主义，并非马克思原著的真主义，而是斯大林教科书的假主义。我们要用原著真马取代教科书假马，这是去伪存真、取信于人的第一重超越。

守正创新，就是要首先回归共产党宣言即共产主义的本来立场，在这个守正的基础上，通过双创两结合，丰富、深化和发展共产主义学说，使之成为知行果合一的新共产主义，用新马超越旧马，这是守正创新、现实可行的第二重超越。

#辨析科学与哲学# #什么是新时代# #何为知识分子# #认知的变迁#

附：【英雄帖】发起新旧文化四大战役

当代圣贤朱老师，2024 年元月来头条，东方圣人宣布出山，高调宣讲中国新文化，新旧文化思想观念的冲突无可避免，那就让思想革命的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

这一场正在发生的旷日持久的新旧文化大战，已经超出了中国文化革新的范畴，而成为引领世界人类精神文化从工业文明迈入生态文明的道德至高点，它的一个核心是共产主义 ABC，其战略目标是道德重建，文化先行。

主要包括两大领域四大战役，即：

(1) 新马克思主义——新共产主义领域，主要发起：

①复旧如新的原著真马对曲学阿世的传统教科书假马的真伪大战，去伪存真，取信于人；

②双创二结合的新马对传统观念的旧马的虚实大战，守正创新，现实可行；

(2) 中华圣贤道德——新国学领域，主要发起：

③自然道德（真理+科学、道德+实践）对伦理道德（儒法二显学、中庸+西劣）的正邪大战，扶正祛邪，拨乱反正；

④圣贤道德（现实可行）对宗教信仰（空谈误国）的真伪大战，正本清源，重本远末。

当前，引起国内外不少有识者关注，经过一段时间的学术研究和独立思考，纷纷认可朱老师，就是全网正在寻找的那个真圣人，希望跟随朱老师学习新国学四柱，增强文化自觉文化自信，参加这一场新旧文化大战，在大风大浪中锻炼成长，早日改邪归正、立功赎罪、功成正果，为人类生态文明建设作出贡献，实现自我，不枉人生！

#东西方哲学思考# #中国哲学感悟# #聊聊科学与哲学#

教条主义，让人着迷却没用的形式主义

网上，由于共产主义处于黎明前的黑暗，遭遇革命实践中理论不彻底的巨大挫折，马列毛都遭遇了不同程度方式的修正主义困扰。

比如，第二国际时期，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变成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被认为不可实现的，比如伯恩斯坦的修正主义；

第三国际时期，列宁实践的共产主义变成了斯大林的国家主义，共产主义被人为搁置，对于何时过渡到共产主义，斯大林千难万难，变得遥遥无期。

同样，毛泽东思想核心的共产主义，也被一些人剥除，只剩下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比如文革被逐出毛思想，改开名人何新公开反对共产主义。

当代圣贤朱老师指出，毛式马克思主义就是一种让人着迷却没啥用的形式主义，属于假毛和假马。好比说，把马克思主义这件红马甲，装饰上一些漂亮中国结，就变成了一件中国红马甲。

众所周知，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核心只有一个：共产主义。这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更是一个实践问题。比如，著名的巴黎公社起义、列宁十月革命、毛主席文革，都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实践，试错的历史代价，证明了理论不彻底会带来极大危害性。

问题在于，无论是右派反对马列毛，还是左派为马列毛辩护，中派左右逢源

不置可否，共产主义理论彻底化和如何早日实现等问题解决了吗？一个都没有！

毛主席指出，教条主义和修正主义都是错误的。可以说，正是因为先有教条主义的无知无能，才导致了后来修正主义的泛滥成灾。比如传统教科书的假马和旧马。

朱云川：东方圣人说新马

一、马克思主义是从哪里来的

众所周知，五四运动是反儒的，以民主与科学为旗帜；中共是靠马克思主义起家的，以共产主义为旗帜。

从表面上看，民主科学和马克思主义都来自于西方，五四运动和中共建立都是西方文化的产物，这是大多数人的观点。

因此，左派旧马和右派西学都向往西方，事实上崇洋媚外；中派儒家都反对五四，抵制马克思主义，败走台湾的国民党蒋介石集团，俨然成了保卫中国儒家文化的功臣，而受一部分国人和民族主义者追捧，掀起了旧国学热、民国潮。

当代圣贤朱老师指出，五四运动和中共建立，就是尊道贵德，贬退儒法二显学，破除其庸劣塞道、祸乱中国等时弊的伟大历史进程。

在清末民族危亡之际，曾国藩说：“欲救中国，当以老庄为体，禹墨为用。”不同于张之洞等人的“中（旧、儒）学为体，西学为用”。可以说，张曾二人的不同主张，正是后来国共两党的道路分歧所在。

其中，五四的民主科学，相当于中国墨家思想，坚持科技创新改良社会，尚贤尚同，有为而治。墨家就是反儒起家的，相当于国家主义、国民党三民主义。

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相当于中国道德（黄老）思想，坚持真理指导社会实践，唯道是从，无为而治。事实上，圣贤、道德家、共产党人是同义词。

中国的炎帝指德，炎帝好比西方的光明神，都是伟大的发明家；中国的黄帝指道，则是中华人文始祖，也是人类文明天下共主。炎黄子孙，指圣贤、道德子孙也；黄老，指老子之道术也！

事实证明，五四运动也好，中共建立也罢，对中国人来说，都是去伪存真、扶正祛邪的归根复命，如比唐僧五众回归中土、道德之乡的认祖归宗仪式。

总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不是西方外来文化的殖民化影响，而是重建中国圣贤道德的文化复旧如新，是中国人用道墨圣贤之道根本破除儒法庸劣塞道的伟大革命。

二、共产主义等于马克思主义吗

众所周知，马克思是赞成共产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与共产主义是不是同义词，两个概念一直没有搞清楚。比如，马克思说过：“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邓小平说：“马克思主义的另一个名词就是共产主义。”

当代圣贤朱老师指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特指马克思恩格斯本人赞成的主义，以及可以直接推导出来的结论。显然，马克思恩格斯都赞成共产主义，他们始终都是共产主义者。

正如中国人民大学一级教授陈先达说过：“没有共产主义，就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换言之，中共坚持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正确理解只能是共产主义。

与之并列的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不应等同于马克思主义，而是共产主义领导社会主义的革命与建设实践，严格讲属于共产主义统一战线（共+社），属于马克思主义同一阵营。

而那些离开乃至至于抛弃共产主义的社会主义，比如孙中山的新旧三民主义（社会主义统一战线，即社+资、社+共），希特勒的国家社会主义（法西斯主义），斯大林的伪科学社会主义，等等，占主导的都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共产主义，显然不是马克思主义。

总之，对马克思主义而言，共产主义是真身，马克思主义是红马甲。共产主义者穿上它，坚持干共产主义，比如列宁、毛主席；非共产主义者穿上它，拒绝干共产主义，比如孙中山、斯大林。

三、马列毛主义各有啥不同呢

当今社会，在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里，主要分三大块：马列毛、邓三科、新时代。不难发现，其对应特色也分三大块，马列毛重政治挂帅，邓三科重经济中心，新时代重文化先行。

单讲马列毛，三者有什么同与不同呢？当代圣贤朱老师指出，马列毛同在坚持共产主义领导社会主义（共+社），不同在主要依靠群体（工+农+兵）。

可以说，马克思恩格斯主要依靠工人阶级，适合欧洲国情；列宁主要依靠士兵和工人，适合俄国国情；毛主席主要依靠农民和穷人，适合中国国情。

在新时代深化改革的伟大历史进程中，我们不仅要坚持工农兵与民众大联合，更要坚持有人民立场、道德自觉、文化自信的知识分子领导工农兵与民众大联合。

这就决定了，马克思主义必须完成中国化时代化，要与中国国情相结合，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才能真正实现守正创新，建立指导当代中国从社会主义走向共产主义的新文化。

#东西方哲学思考# #真理与知识# #何谓圣人？# #何为知识分子？#

四、新时代清除三大社会公害

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是革命的首要问题。

——毛主席语录

这里，我们——指共产党人及其领导的共产主义人民革命事业；朋友——指支持共产主义，愿意和参加社会革命的人民大众；敌人——指反对共产主义，不愿意或反对社会革命的一小部分坏人。

历史上，无论是反对国内外敌人的暴力革命，还是推动社会主义建设和完善的继续革命，乃至今天坚持刀刃向内的社会主义自我革命，我友敌三方务必要分清，否则革命就不可能成功，或者遭遇重大失败。

毫无疑问，我们共产党人始终坚持实事求是、公平正义、为人民服务。工农兵依然是我们共产党人的主要依靠力量，而善待共产主义的其他民众是我们的朋友。敌视共产主义、危害人民利益和社会安全的一小部分人，比如今天的贪官、精蝇、暴发户三大社会公害，就是我们的敌人。

在新时代，我们并不提倡暴力革命，随意剥夺他人生命，不得已而用之。但是，如果对三大社会公害听之任之，无所作为，那就是对人民的犯罪。因此，针对三大社会公害，逐一排查和根本治理是十分必要的。

当代圣贤朱老师指出：

其一，治贪官，根子在思想，诱惑在利益，实施在权力。可反其道而行之：

①实施公务员责任制和五年轮换制，严格执行党规党纪，难以形成官本位；
②对贪官执行双开，一撸到底，剥夺其政治权力和社会影响力，使其不能腐；
③没收其家人和家族、利益共同体等不正当所得和巨额财产。即使合法（钻空子）地过多占有社会财富，也是对人民犯罪；

④在文化上长期坚持扬道弃儒（二十年以上），破除贪官文化背景，预防犯罪，杀不用刀，使世人不想腐。

其二，治精蝇，必须坚持学术和政治分开，疏堵结合，坚持实事求是——允许且鼓励人民说真话，支持守正创新；反对弄虚作假——说谎有罪，假话入刑。对故意说谎的大小知识分子，除了开除公职，政治上禁言外，还要配合经济重罚和刑事拘留。尤其是对外国代言人，纳入失信人黑名单。

其三，治暴发户，主要指那些拜金主义，依靠不正当手段发财而爱显摆、辱骂穷人的人群，没收其巨额财产，个人留一点生活费即可。

#真理值得实践# #伟人的一生信念# #伟人一生的精神# #无不政治思想# #伟人活在众心中#

圣人文化能不能改变社会和世界

网上有人说，朱老师以当代圣贤自许，新文化是对的，人品初心是好的，境界也是有的，学术上无懈可击，只是有没有用？目前还看不出来！

平心而论，作为宗教化神秘化庸俗化的传统观念，无论是中国、西方、传统文化，比如传统教科书的旧马、世界五大宗教等，都只是说说而已，对指导社会实践和促进社会进步，并无什么明显的正面作用。

然而，如果是新马呢？圣贤道德呢？中国新文化（新国学）呢？未必没有巨大的正面作用？正所谓：备物致用，立象成器，以为天下利，莫大乎圣人。

一名日本学者说：“《道德经》有一种魅力，它给在世俗世界压迫下疲惫的人们一种神奇的力量。”

又有人说，文化没有什么力量，只有科技才能改善生活，才能改变世界！

须知，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最基本、最深沉、最持久的力量。只不过，大多数并不知文化究竟是什么，那是一种什么样的力量？

当代圣贤朱老师指出，文化指人与自然（真实）的关系，叫天道。区别于经济指人与物的关系，叫地道；政治指人与人的关系，叫人道；文艺指人与自我（内心）的关系，叫鬼神。

以西游记主要角色为例，文化孙悟空先于、大于且高于文艺白龙马、经济猪八戒、政治沙和尚，都是共同为人民唐僧服务的辅助和工具。

除了文艺、宣传、宗教因为人多势众，具有一种强大的盲从的信仰力量外，天地人、文经政、精气神、知行果，它们一一对应，具有三大神奇力量，分别是真实就是力量——真理即道德力量，知识就是力量——金钱即财富力量，团结就是力量——权力即组织力量。

就是说：

精元……气血……神志

基因……肉体……意识

天道……地道……人道

悟空……悟能……悟净

文化……经济……政治

根干……枝叶……花果

知道……行为……结果

真实……知识……团结

真理……金钱……权力

道德……财富……组织

众所周知，没有基因，世界生命全无；没有根干，枝叶花果全无。不真实的知识，是伪知识；不真实的团结，是假团结。没有道德的财富，是邪恶；没有道德的组织，是邪教。

圣人文化就是基因、真实、道德。不知者无罪。没有看过本文，可以叫无知。看过本文后，谁还说圣人文化无用，没有力量呢？那只能叫无耻！

#何谓圣人？# #中国哲学感悟# #哲学有用吗？# #哲学是否有用？# #东西方哲学思考# #关于哲学那些事# #真理与知识#

当今社会患大师饥渴症，有专家缺大师

当今社会，哲学或国学界究竟有没有大师？答案是没有大师。中央 5.17 文件是这样说的：

“哲学社会科学领域还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比如，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战略还不十分明确，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水平总体不高，学术原创能力还不强；哲学社会科学训练培养教育体系不健全，学术评价体系不够科学，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还不完善；人才队伍总体素质亟待提高，学风方面问题还比较突出，等等。总的看，我国哲学社会科学还处于有数量缺质量、有专家缺大师的状况，作用没有充分发挥出来。”

就是说，专家不等于大师，那算什么呢？哲社名人或职业工作者。比如，北大、人大一些良心未泯的老教授，拒称哲学家，拒绝国学大师帽子，只算哲学工作者，颇有自知之明。

当代圣贤朱老师指出，当今中国只有名人、专家，确无大师

。但有圣人，更有圣贤。关键看天爵（素质、水平和成果），不看人爵（文凭、职称或职务）。

天爵，可分八个等级：

圣贤（道德）——太上超一等，又明白又实干者，易知易行；

圣（道）——圣人一等，明白的老实人，知易行难；

家（德）——贤人二等，勤能的实干家，知难行易；

师（仁）——大师三等，在一定专业内确有新成果，为专业权威，知名度大，影响力强的人；

匠（义）——名人四等，只是在一定专业内有名气的人；

工（礼）——老师五等，中规中矩吃职业饭的人；

徒（知）——学生六等，专业技术未学成的徒弟；

奴（信）——信徒七等，哲学门外汉、思想大杂烩、宗教爱好者。

显然，圣贤、圣人、贤人都是老实人，天爵取决于自己认可，不必由别人认可。大师、专家（名人）、老师，可由同行评议，具有一定专业水平。学生、信徒，为不入流，本质上都是门外汉。

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之所以缺大师，主要是缺有质量的成果，这仅限于对官学的自我评价，也是大力呼唤守正创新的深层次原因。

无庸讳言，学术在民间，圣贤在底层，这是中国文化的当代困境。民哲中人呈两极分化，绝大多数属于门外汉，专家也少，但也有极少数人属于天才、圣贤！

#关于哲学那些事# #哲学来了# #哲学是否有用？# #哲学启示录# #哲学深度探讨# #何谓圣人？#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吃人秘密

#为什么发达国家都是资本主义国家？#当今世界有一个现象，为什么发达国家都是资本主义国家？以至于右派把资本主义崇拜得不得了，有人称为《历史的终结》。这个现象究竟是什么呢？

放眼中国历史，从秦国商鞅变法到秦始皇统一六国，修筑长城，统一文字等，这肯定是发达国家的伟大壮举。然而，秦朝却二世而亡，这也必然是发达国家的历史结局！

老子曰：“物壮则老，是谓不道。不道早已！”两千多年前，天下苦秦久矣！两千多年后，天下苦美久矣！发达国家的吃人历史，古今中外何其相似呢？！

当代圣贤朱老师指出，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历史之所以相似，在于法家思想——依法治国。这是一种没有道德的邪恶财富——战争掠夺，也是一种不要道德的邪教组织——帝国主义。

事实上，对发达国家奉行帝国主义，任何历史的或道德的谴责都是苍白无力的，因为落后就会挨打。法家根本不在乎别人的苦难，好比狼吃羊（人民），吃得天经地义，理所当然！

唯有更强大的文明战而胜之，它们技不如人，只能甘拜下风！有没有比竭泽而渔的资本主义、杀鸡取卵的帝国主义更强大的文明呢？当然有！

从社会发展模式论看，帝国主义 C/D 强于军事，战争掠夺；资本主义 B+C 强于商业，物质财富；封建主义 A+C 强于农业，团结精神；国家主义 A+B 强于工业，科技创新；共产主义 A+B+C 强于道德，综合国力。

比如，春秋战国时期的齐国与鲁国，儒家封建主义鲁国，虽然物质不如法家

资本主义齐国，但胜在人心团结，有政治凝聚力，国运不旺，但更长久。

至于墨家国家主义，好比法西斯主义德国，有举国体制，科技和效率都很发达，远超过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墨家讲尚贤尚同，国家以精英为本位，败在伪精英冒充人才，庸劣塞道，难以持久。

只有共产主义 A+B+C，实事求是，尊道贵德，以人民为本位，以道莅天下，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是比前四者都更强大的文明。

历史上，并不是所有资本主义国家都是发达国家。

部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之所以发达，最大优势在于，经济上解放财富 $BC >$ 压制财富 CB，文化上重视工业科技 BA 转化为战争潜力 C/D，政治上民主选举欺骗 AC。实际上，所谓发达国家就是帝国主义军事、资本主义财富、封建主义民主、国家主义科技的军工混合体——寡头独占好处，内耗在所难免。

从共产主义 A+B+C 三位一体，上升到自然（真实）共产主义 ABC，即本末有序的共同主义，以道莅天下，以正治国，无为而治——以最轻松最有效的方式配置各类社会资源，从而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国泰民安、共同富裕的天下太平。

#历史哲学思考# #世界史略谈# #探寻历史哲学# #西方文明的真相# #东西方哲学思考# #世界历史的探讨#

（以上本栏目选刊文章，均为朱云川老师近作。）

【反思的毛派】

纪念列宁：他的思想代表着未来

原创 托尼·克里夫 阶级与哲学 2024-01-21

列宁。这个名字被斯大林和俄国革命的掘墓人变成了无所不能的偶像和神明。在西方，则被社会主义的资本主义反对者描绘成暴君和独裁者。

两者都不。真正的列宁毕生致力于解放俄国乃至全世界的劳动人民。他为建立一个由革命者组成的坚强政党而奋斗，以便组织夺取政权的斗争。

最重要的是，列宁坚信劳动人民有能力摆脱压迫者的枷锁。为纪念列宁逝世五十周年，托尼·克里夫决心从“铁幕”两侧的敌人手中拯救这位革命领袖。

五十年前，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领袖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逝世。

在他逝世周年之际，莫斯科及其朋友与西方的反共斗士竭尽全力试图歪曲这位伟人的真实历史作用。

长久以来，人们一直传说列宁是斯大林主义之父，信奉极权独裁。这与事实大相径庭。

列宁在其杰出著作《国家与革命》中描述了过去革命领袖的命运，从而预言了自己的下场：

“当伟大的革命家在世时，压迫阶级总是不断迫害他们，以最恶毒的敌意，最疯狂的仇恨，最放肆的造谣和诽谤对待他们的学说。在他们逝世以后，便试图把他们变成无害的神像，可以说把他们偶像化，赋予他们的名字某种荣誉，以便‘安慰’和愚弄被压迫阶级，同时却阉割革命学说的内容，磨去它的革命锋芒，把它庸俗化。”

最重要的是，列宁对群众的首创精神有着绝对的信心。例如，他在 1905 年 6 月至 7 月写道：

“革命是被压迫者和被剥削者的盛大节日。人民群众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像在革命时期这样以新社会制度的积极创造者的身分出现。在这样的时期，人民能够作出从市侩的渐进主义的狭小尺度看来是不可思议的奇迹。”

工人在斗争中学习。他们从自己的战斗经验中学习。一个真正始终如一的革命社会主义工人政党的作用不是向工人说教，而是在斗争中向工人学习，在斗争中帮助他们。

当资产阶级士绅及其不加批判的附和者——社会改良主义者——谈论“群众教育”时，他们通常指的是校长式的、迂腐的东西，是只会打击群众士气、向他们灌输资产阶级偏见的东西。

群众的真正教育永远离不开他们独立的政治斗争，尤其是革命斗争。只有斗争才能教育被剥削阶级。只有斗争才能使被剥削阶级认识到自身力量的巨大，扩大它的视野，提高它的能力，澄清它的思想，锻造它的意志。

革命社会主义政党的目标是挖掘隐藏在群众中的能量和创造力的潜质。党必须向斗争中的工人学习：

“人民”，即不剥削他人劳动的工人和农民中蕴含着大量的组织才能。资本压垮了成千上万有才华的人，扼杀了他们的天赋，把他们扔进了垃圾堆。

我们还无力组织他们，鼓励他们，让他们站起来，提升他们。但是如果我们以全力以赴的革命热情去做这件事，我们就将学会怎么做。没有这种热情，就不可能有革命的胜利。

为了向群众学习，党还必须能够并准备从自己的错误中吸取教训，进行自我批评。正如列宁所说：

“一个政党对自身错误的态度，是判断这个政党的认真程度如何，在实践中如何履行对本阶级和劳动人民的义务的最重要和最可靠的方法之一。坦率地承认错误，查明错误的原因，分析导致错误的条件，并提出纠正错误的手段——这是一个严肃的政党的标志。这关乎它应该如何履行职责，它应该如何教育和训练它的阶级，以及群众。”

在直接的革命斗争的时期，公开辩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和必需。因此，列宁在 1906 年 4 月 25 日至 26 日的传单中写道：

“在像现在这样的革命时代，党的所有理论错误和策略偏差都受到经验本身的最无情的批评，这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启发和教育了工人阶级。

在这个时候，每个社会主义者的责任是努力保证党内关于理论和策略问题的思想斗争尽可能公开、广泛和自由地进行，但决不能扰乱或妨碍社会民主主义无

产阶级革命行动的统一。

革命的无产阶级政党足够强大，能够公开批评自己，并毫不含糊地正确指出错误和弱点。先进阶级的战斗党不需要害怕错误。它应该害怕的是坚持错误，出于错误的羞耻感拒绝承认和纠正错误。”

当然，党内讨论决不能影响和阻碍纪律性和行动的统一。恰恰相反，党内民主必须成为团结一致行动的基础。正如列宁所说：

“我们已经不止一次地阐明了我们关于纪律的重要性以及在工人阶级政党中如何理解这一概念的理论观点。我们将其定义为：行动的统一、讨论和批评的自由。只有这样的纪律才配得上先进阶级的民主党。”

没有讨论和批评的自由，无产阶级就不会承认行动的统一。没有充分明确的本质区别，没有各种倾向之间的公开斗争，没有让群众知道党的哪些领导人和哪些组织奉行这样或那样的路线，就不可能有群众性的党，就不可能有一个阶级的党。没有这些，就不可能建立名副其实的党。”

与斯大林主义的神话以及布尔什维主义的自由派批评者相反，布尔什维克党从来都不是一个铁板一块或极权主义的政党。真相并非如此。

内部民主一直是党内生活的重中之重。因此，当最重要的问题，即 1917 年十月起义问题成为当务之急时，领导层就出现了尖锐的分歧：由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李可夫、皮亚塔科夫（Piatakov）、米留京（Miliutin）和诺金（Nogin）领导的强大派系反对起义。

然而，当中央委员会选举政治局时，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都没有被排除在外。

布尔什维克上台后，党的领导层分歧继续像以前一样尖锐。革命几天后，一些领导人提出了与其他社会主义政党结盟的要求。

坚持这一点的人包括内政人民委员李可夫、工贸人民委员米留京、教育委员卢那察尔斯基、担任主席的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

他们甚至辞去了政府职务，从而迫使列宁及其支持者与其他政党展开谈判。谈判之所以破裂是因为右翼社会主义者坚持将列宁和托洛茨基排除在联合政府之外。

1917 年 12 月，在举行或推迟立宪会议选举的问题上，列宁发现自己在中央

委员会中占少数，选举是违背他的建议举行的。

不久之后，他在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与德国的和平谈判问题上再次被击败。列宁主张立即实现和平。但是，在 1918 年 1 月 21 日举行的中央委员会和积极工人会议上，他的动议仅获得 15 票，而他反对的布哈林的“革命战争”动议获得 32 票，托洛茨基的“既不和平也不战争”的动议则获得 16 票。

在第二天的中央委员会会议上，列宁再次被击败。但在形势的压力下，他最终成功地说服了中央委员会的大多数成员接受他的观点。在 2 月 24 日的会议上，他的和平动议获得了七票支持，四票反对，四票弃权。

在经历了近七年的战争和内战、右翼劳工领袖背叛德国革命（包括伟大的社会主义领袖罗莎·卢森堡和卡尔·李卜克内西被谋杀）后，虚弱不堪的工人阶级使得俄国革命陷入孤立，斯大林主义官僚集团在俄罗斯崛起。

在 20 世纪 30 年代列宁的战友、老近卫军被大规模谋杀后，官僚巩固了自己的地位。在工厂里，经理的收入是工人的 100 倍，工人没有罢工的权利，被剥夺了所有自由。这种“一长制”成为了斯大林主义政权的标志。

但未来仍属于马克思和列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如下：

工人阶级是社会主义的推动者。

工人阶级需要先锋队的领导，以便提高它的战斗能力、觉悟水平和组织性。

需要粉碎资本主义的官僚军国主义警察国家机器，代之以民主的工人委员会，所有官员只享有与他们所代表的工人相同的工资，定期选举所有官员并有权罢免他们。

这些思想对世界各地的工人都至关重要，无论是在英国还是俄罗斯、美国、中国或者印度。

马克思和列宁的思想代表着人类的未来！

【注】《列宁：他的思想代表着未来》，作者：托尼·克里夫 1974 年 2 月。首次发表于《社会主义工人》（*Socialist Worker*）第 359 期，1974 年 2 月 2 日。重印于托尼·克里夫作品《既非华盛顿也非莫斯科》（*Neither Washington nor Moscow*），伦敦版，1982 年，第 253-6 页。翻译：彼得；排版：墨墨。阶级与哲学编辑部刊发。

传统教科书：形而上学唯物主义

——披着科学外衣的新时代宗教

原创 Misaki 异见 Andersverstehen 2024-01-25

由于必修四《哲学与文化》等教科书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化、简单化处理，和当下教育结构导致的学习本身异化为一种博得他者的认同和争夺垄断性支配位置的工具，在学校 AIE 下的学生也大多数时候仅仅去僵硬地背诵马克思主义的话语，并用日常话语来对其中的哲学话语和政治经济学话语进行通俗化理解，而大多数时候我们的理解与马克思主义的原意相差甚远。就“唯物主义”来说，很多人将马克思的“唯物主义”简单把握为：物质决定意识，物质是客观存在的世界本原，物质不依赖于意识，而意识是派生的。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不仅对黑格尔派的“唯心主义者”进行批判，同时也对费尔巴哈及其以前的一些传统意义上的“唯物主义者”进行了批判。费尔巴哈将人仅仅看作“感性对象”，认为人简单地对自然界进行直观，人周围的感性世界是直接存在的，人对其的直观能力也始终如一——这事实上就是很多时候我们对“唯物主义”的理解，这是一种形而上学唯物主义，在这种唯物主义中我们将“物”把握为客观存在的自然对象，是不依赖于人的，自然界是在人之前就绝对存在的——而马克思认为这种观点只有在人被看作是某种与自然界不同的东西时才有意义。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提到当时的樱桃树，樱桃树在马克思那个时代之前几个世纪移植到他当时所居住的地区，马克思以此说明就连我们的“感性确定性”也必须依赖社会在一定时期的活动——“樱桃树只是由于一定社会在一定时期的这种活动才被费尔巴哈所感知”。

广大公众甚至不认为能够提出诸如外部世界是否客观地存在的问题。人们只要提出这个问题就会引起一阵压制不住的大笑的爆发。公众‘相信’外部世界是客观地现实的，但是问题产生了：那个‘相信’的根源是什么，‘客观地’此词的决定性价值是什么？在事实上，这个信仰具有宗教的根源，即使那个分享这个信仰的人对宗教并不感兴趣。因为一切宗教都在教诲而且还在教诲说，世界、自然、宇宙都是在上帝创造人之前所创造的，所以，人发现世界上的一切都是现成的，被编好了目，被一劳永逸地规定好了。这个信仰变成了‘常识’的铁的事实，

即使宗教感情死了或者沉睡了，它还同样的顽固。

我们所认为的“唯物主义”更多的是一种“相信”，这个时代的大多数人不再去相信一个无形的“鬼神”——我们责问有神论者：你能找到上帝让我看看吗？——然而我们仍然相信客观的“物”的存在，事实上我们只不过在相信一种上帝被剔除了的宗教。这种宗教有时还会与技术理性相结合，成为了一种披着科学外衣的形而上学唯物主义，它告诉我们原子、电子等科学话语并非仅仅是一种研究方式，而是客观存在的，它们作为实体构建了整个世界。马克思时代的科学（经典物理学）在方法上是追求人以外的一种客观性，去脱离人来把握“宇宙”“自然”等“客观存在”。事实上客观性总是指人的客观性，我们所谓的客观存在是历史生成的。

客观的总是指‘人类的客观’，它意味着正好同‘历史的主观’相符合，这就是说，‘客观的’意味着‘普遍地主观的’。人客观地认知，这是在对于被历史地统一在一个单个的文化体系中的整个人类来说知识是实在的范围内来说的。

科学技术在“解释世界”的同时，不仅仅作为“无害的学术”试图将整个世界完全符号化，在科学发挥它巨大的推动生产力发展作用的同时，它的意识形态作用也衍生出来：在符号化的过程中排除了人的主体性，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技术理性表现为：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再生产了社会分工的意识形态，人在学校和市场被“绩效”“成绩”“学历”等定价，这种意识形态将人变成了资本主义符号秩序下的螺丝钉。

这种形而上学唯物主义表面上向我们诉说客观世界的真实性，但同时也诉说着客观规律的绝对性——它告诉我们客观规律不可违背，而问题是这些客观规律是谁创造的。我们经常会说到“历史的车轮”，在很多人看来“历史的车轮”是个体无法改变的，共产主义必须等到物质及其丰裕的时候才能实现——我们将一切都归于生产力的不足，归于一个机械运转的历史，但何时是物质足够丰裕的时候呢，何时是变革到来的那一刻呢？巴迪欧质问道：我们要花多久才能接受这个事实：足够全人类享用的自来水、学校、医院和食物所需的金额相当于富裕的西方国家一年花费在香水上的数量！资本主义时代的人口并非绝对过剩的，今天的物质绝不是贫乏到不够劳动者再生产自身，资本主义制度下的人口过剩是相对的。大量失业人口不仅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必然产物，而且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存

在和发展的条件。

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做人的感性活动，当做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

如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所说：“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 [gegenständliche] 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唯物主义”应当从我们自身的实践出发去构建，在马克思那里，实践起到的作用是对费尔巴哈的“人的类本质”的替换，现实的人并非费尔巴哈所理解的“感性对象”而是一种“感性活动”，实践不是“人对世界的解释模式”，而是实践回溯性构建了解释世界的理论，因而实践是一切的出发点。

张维迎：“你说话注意点，小心点！”

原标题：张维迎：我这几十年听到最多的劝告是“你说话注意点，小心点！”

镇西茶馆 2024-01-26

1993 年 5 月，我曾给清华大学校长张孝文写过一封信，谈在清华大学办经济研究机构或者经济系的设想。在海南参加会议时，我碰到了林毅夫先生、易纲先生，我们三个人一拍即合，决定一起在北大办个新的经济研究机构。北大吴树青校长非常支持，后来就在北大成立了“中国经济研究中心”（CCER）。

我当院长也是阴差阳错。我自身想搞学问，我喜欢教书，好为人师，从没想过要做行政工作。但 1999 年 1 月北大光华管理学院换届，校领导在没找我谈话的情况下，任命我为第一副院长。当时的院长是厉以宁教授，第一副院长等于主持日常工作，对我来说是个意外。但既然要做，那就认真地做，我就提出了一整套设想，包括大刀阔斧地改革、引进人才。

当时引进了一个牛津博士毕业的德国人，但他总是自觉高人一等，三个月之后就被我开除了。当时院里分配给他一间办公室，他嫌小，说：“我是德国人，经常接待我们国家来的人，这么小的办公室会给学院丢人。”我说：“我们所有的教授都是这样规格的办公室，何况你还只是副教授。”他说：“那你的办公室怎么这么大？”我说因为我是主持学院工作的副院长。过了一段时间，他将半年的课

压缩到两个月讲完，之后没有通知我便回德国去了。我就很恼火，给他写了一封信：“对不起，我们要终止与你的合同了，因为你没有遵守我们的约定。”后来他写信给学校领导告我，我还写了一个很长的解释。

我们政府老说吸引人才，但待遇太低确实很难吸引到人才。我们一个教授一年的工资几万块钱已经算不错了。但光华管理学院引进的讲师年薪可以达到 24 万元，副教授可以达到 32 万元，教授 40 多万元，当时 24 万元人民币等于 3 万美元。这个改革力度相当大，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在一个单位里面，工作几十年的人拿到的工资只是刚来的人的几分之一，现在想起来都有点后怕。为什么当时能够推动这样的政策？改革是大势，改革的事能够放在桌面上谈：大家同意不同意我们应该办成世界一流的商学院？同意。办成一流商学院没有一流的老师行不行？不行。怎么弄来一流老师？引进人才。靠现在的工资能不能引进？不能引进。所以一定要涨工资！逻辑就是这样的。

现在中国很多商学院的做法应该都是步我们的后尘。曾有一个大学老师说，都是张维迎惹的祸，本来不搞这些改革，大家平静日子过得很好，他在北大这么一折腾，其他商学院不动也不行了，就带来一系列问题，搞得鸡犬不宁。

改革进行到势头正好的时候，反改革的势力往往是隐藏在暗处的，它们通常不会选择正面冲突，而是会积蓄力量，静待时机，寻找改革的薄弱点，然后发起进攻。

我在光华做了一段时间，学校想让我到学校做，任命了我一个协助管人事的工作。任命下达了三天，开会时我就提出一份人事改革建议书。大家都觉得，太着急了，刚给你一点位置，就一点机会都不浪费。但是，我写的改革建议很有说服力，所以在会议上几乎把所有人都说服了。我也很高兴，好多人还是希望变革的，希望把学校建设好。没想到麻烦在后面。当时，学校任命了一个改革方案起草工作小组，我负责起草这件事，那是 2003 年春天，刚好赶上 SARS（非典型性肺炎）爆发，学校没法开会，就把材料发下去，结果有人把这份材料直接发在了网上，网上就有很多人骂我。

我因此得罪了很多，我觉得自己还是一心做好事，但是别人不一定也这样认为，反对的声音用各种的方式来批判我，包括人身攻击。我们有一个院系的副教授已经很多年没写学术论文了，但为了批判我这个改革方案，专门写了 9 篇。

好多人说，我是在用企业的逻辑改造大学，因为我是研究企业理论的。为了应战，我后来出了一本《大学的逻辑》。许多大学的领导说他们读过这本书，很喜欢。

在这个过程当中，我甚至会觉得学校是中国改革最落后的领域。大学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每个人都会自以为是，知识分子都有这个特点，谁都不认为自己技不如人，谁都不认为自己不如别人正确或者不如别人有思想，所以吵得非常厉害。

当时讨论这个改革方案，让我主持全校的中层干部会议，每个院系派一个人来谈意见。按规定每个人的发言时间必须控制在 20 分钟内，其中有一个院系的书记反对我的改革方案，我主持的时候就不好意思打断他，他一直拖到 40 多分钟还没谈完。我就给他递了一个纸条：“时间到了，不能再谈了。”后来，这件事变成了一个什么问题呢？“张维迎听不进去不同意见，谈不同意见就打断别人！”但是事实上，他占了两个人的时间，却不会从这个角度考虑。

学校党委换届选举，我的票数是倒数第一，但我不在乎。那天中午，校长给我打电话说：“维迎，我听大家反映，你在凤凰卫视的《世纪大讲堂》里面批评北大。我专门看了，我觉得你说的没错，并不是他们说的那样，你是出于积极的建设。但是我要事先告诉你，下午投票可能过不了。”我说，“那没关系”。当然我也没想到结果那么惨，居然倒数第一。

很多人觉得北大改革失败了。但我必须说，至少在改革的精神上没有失败，这种尝试还是起了很大的作用。有时候改革不在于口号，而在于实际执行的人是什么样的心态。

2010 年底，我卸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职务。这对我来说真是天赐良机。我在那个时候已经很疲倦，老在犹豫这个事干还是不干。有人说，为了学院的利益你必须得干，你招来这么多人，你就得担起一种责任。另一方面，我确实很疲劳，有点不太想干。这时候，别人帮我解决了这个问题，解决了我的困惑，我不需要再干了。后来，我自己想了想，觉得我适合提出思想来，不适合去具体操作。

此前国外好多人都已经知道我当了北大光华管理学院院长，他们公认，不要说中国，全世界要找这样的院长也不是很容易的。所以，我在国外的商学院院长中还是很受尊重的，到现在很多人仍然说起我，国内的好多院长对我也很尊重，因为我确实起了一个头，才引发了这些改革。

对我来说，读书、思考、写书、演讲、教书是我最擅长的事，由于这样一件阴差阳错的事，我又回到了我擅长做的事情上来。

我在这几十年中，听到最多的劝告就是：“维迎，你说话注意点，小心点！”大家都对我很爱护。但是，我相信人类要进步，就得有一种超越现实、超越功利的想法。要有这样一批人，我们的社会才能进步。我不能说自己有多伟大，只是觉得我将按我的信仰，按我的理念去做。我不在乎别人对我怎么说，但我会思考自己说出来的是不是代表自己认知的逻辑，是不是符合人类的理性。如果达到这一点的话，我觉得就可以了。我很喜欢这种生活。

（张维迎 著名经济学家、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

“姓资姓社”，谁才是“通往奴役之路”

原标题：米莱重启“姓资姓社”之争，谁才是“通往奴役之路”？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田飞龙

中央民族大学法学院副院长，法学博士

米莱当选，美洲震惊。米莱达沃斯演讲，举世愕然。

在一个混杂多元的世界，米莱的原教旨自由主义宣言及其配套的激进自由化改革措施，让人们看到了一个疯狂的“加强版休克疗法”正在阿根廷展开，而且可能对全世界范围内的经济思想和政治路线产生冲击。

在从政以前，米莱更多是以经济学家的身份为人们所熟知，但不是普通的经济学家，而是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是市场原教旨主义的信徒。在他看来，市场至善，政府至恶，个人至善，集体至恶，由此推演出自由资本主义至善，社会主义与集体主义乏善可陈。

米莱演讲有很强的针对性：其一，针对阿根廷经济路线中的集体主义和政府干预因素，要彻底清理既往政策，改行激进的自由主义政策，期待阿根廷出现自由经济奇迹；其二，针对西方世界在经济思想与政治治理上的集体化和社会主义化，提出思想和政治批判，触发西方集体反思与联盟行动；其三，针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及其路线，保持经济思想和意识形态上的批判和对抗。

这三重针对性，从阿根廷国内改革到西方思想救赎再到对社会主义国家的体

系竞争，米莱的思想与政治世界即刻鲜活起来，似乎自我塑造成了西方自由主义的第一思想家和第一政治领袖。比较而言，拜登和布林肯都要相形见绌，黯淡无光了。

米莱在达沃斯经济年会上的演讲，语惊四座

米莱对市场的推崇与对政府的否定，在逻辑上和价值上都是彻底的。米莱的思想逻辑并不新鲜，不过是哈耶克主义的再版。读一读 1940 年代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米莱演讲仿佛是其最精致的读后感和行动书。米莱演讲结尾的口号是“自由万岁”，听起来很有思想穿透力，给绝望中的人们以希望，给多元中的思想以导向，给大变局的世界以“塞壬”之声。

试想，如果各国皆以米莱演讲为政策新路，全球化与经济发展又将如何？米莱预设的是一个极度理想化的自由市场世界，其中政府和集体不起支配作用，个人极度自主，要素自由流动，产业自然匹配，国际贸易畅通无阻。这是一个自由资本主义的乌托邦，是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极致化，但在现实经济和政治实践中从未存在过。

米莱的演讲在网络上激发热议，意见分歧：褒扬者视其为思想知音和政治同道，是哈耶克主义的共同信徒，并借此抨击社会主义甚至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福利政策和产业政策；批评者视其为思想怪物和政治巫师，指责其迷信市场，贬损政府，以及不切实际与后果严重。

米莱演讲最重大的意义在于重启“姓资”与“姓社”之争，并挑起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左右之争，对诸多国家现实性的福利政策、产业政策与治理政策进行根源性攻击。他的思想根源是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市场原教旨主义，他的经济政策路线与美国特朗普主义有一定的重叠和旨趣，但他甚至比特朗普更彻底。阿根廷的“米莱经济学”无法在美国复制，也无法在南美获得积极响应，甚至他的主张从一开始就遭到南美同行的严重质疑。

米莱的思想与政治对手是众多和强大的，既包括南美根深蒂固的左翼政治经济传统，也包括西方的罗斯福主义和凯恩斯主义，还包括以中国为代表的社会主义传统。这些在经济与政治实践中更具现实性和理性的不同传统，反映了人类对政府与市场关系的结构化认知：既非市场至上，也非政府至上，而是各有功能，错落有致。

米莱要将市场推向理想化的极端，事实上在西方体系中也显得格格不入。市场上不只有自由、理性的主体，不只有资本强者，还有依附、感性的群体以及失败的弱者，国家间存在文明与主权之别，存在激烈的竞争与复杂的合作，从国家到人类社会还有共同危机需要应对，这些都不是单纯市场经济就可以完美解决的。

将市场完美化，不承认市场缺陷，不承认资本原罪，不承认集体伦理的合理性，不承认强弱之间的共存伦理，米莱经济学表面讲自由，实则必然导向丛林状态式的弱肉强食，与人类文明进步之道德方向并不相符。即使在亚当-斯密那里，也不是纯粹市场主义，而是市场与政府、社会道德的某种结合。一种逻辑推到极致，凸显的不是“深刻”，而是“片面”。

但人类也许需要阿根廷的这场自由资本主义实验，以便对自由主义的极端版本进行可见的检验，从而为人类在 21 世纪的道德和政治实践提供更清晰的共识与方向。在一个思想混沌和前途未卜的大变局中，米莱之言行有几分唐吉珂德的遗风，也有几分哲学王的自负。米莱需要知行合一，需要阿根廷作为试验场给出一个现实证明。也因此，未来时段阿根廷的经济走向和发展绩效，就会成为举世瞩目的观察评判对象，米莱本人也会是希望和绝望交织的风暴中心。

米莱能否成功，阿根廷经济将给出答案

国内学者对米莱演讲及其政治经济学路线予以现身说法式的抨击，南美墨西哥和委内瑞拉总统也对其加以质疑，西方世界的主要政治领导人并未热烈回应他的主张，更多的学者、投资者和政治观察家则保持了有距离的冷观甚至淡漠。这进一步凸显了在当今世界氛围下米莱及其市场原教旨主义的“孤独”身影。思想的彻底性当然有其逻辑上的酷美，而在混沌不一的炎炎浊世，带有鬼魅色彩的强力批判及其替代性呼吁，自然会带上一股思想与行动的蛊惑魔力，但这个世界从未纯粹，是众人、众口、众国和众生的，政府与市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集体与个体，东方与西方，需要的是辩证和共存，需要的是安顿与互惠，需要的是思想调适与实践检验。

如果米莱笃信社会主义是“通往奴役之路”，那么他所主张的原教旨资本主义则很可能是“通往丛林之路”。对米莱及其思想和信徒而言，这是一场带有根本信仰性质的自由主义道德自救和经济自新的伟大实验。但对于不同文明和区域的国家民族而言，以及全人类的和平发展前途而言，米莱实验可能是一种乌托邦

式的激进展现，其破坏性大于建设性，其后果当然主要是阿根廷人民承受，也必然波及全球和全人类。

米莱的演讲和行动深刻表明，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现代性之争并未终结，在 21 世纪的大变局下仍在变奏展现。米莱思想及其阿根廷实验的未来走势、影响与结果，是人类思想与实践演进的重大研究课题。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我们在大变局中得见这一场思想逻辑的自由资本主义国家性实验，是一种历史的观察契机，也是学术思想磨砺进步的契机。

事实上，早有研究者指出过自由主义思想在 19 世纪后半期出现过“钝化”现象，即自由原则与市场理性需要与社会主义信条、集体价值互动整合，尽管自由仍是本体和原则，但自由不再纯粹，其他的非自由价值取得规范性与合理性，并逐步反映到国家的立法与社会政策之中。甚至自由主义在那个时代的关键代表、《论自由》与《代议制政府》的作者约翰·密尔的思想体系中已然出现集体价值的成分。

可是，自由主义的“钝化”似乎不是思想和政治的退步，而是一种面向人类社会的合理改进，因为人类社会需要的不仅仅是自由，还有共存，还有互爱。在个体与集体的生存辩证法中，个体并不具有绝对的优先性，这甚至成为了人类文明进步的逻辑前提。将个体推到绝对优先地位，实际上是对人类文明连续性和共同体道德秩序的逻辑反动和政治颠覆，其实践后果往往就是“通往丛林之路”。这也是为什么西方在经历一战和二战之后走向了福利主义、民主主义和社会多元主义，而不再留恋甚至迷恋自由的原教旨含义及其市场主义。

当然，市场会失败，政府也会失败。与常在的政府及其失败经验的频繁刺激相比，总有一种思潮或心理倾向会引导人们尝试探问“更彻底的市场”是否是更优选择。这就是米莱灵魂深处的好奇与渴望。但这种好奇与渴望未必建立在真正理性的基础上，其思想主张与实践结果就很难获得普遍支持与认同了。

无论如何，米莱是人类思想与文明演变的一种可能性，一种心理倾向，一种政治猎奇，一种社会想象。阿根廷开启了这一路线的制度实验，无论结果如何，对人类在理性上最终作出正确选择都是一种无法忽视的经验与历史。

（原创 田飞龙 底线思维 2024-01-24）

当代职场现形记，当今社会照妖镜

【导读】官僚主义形式主义是当前最大的社会问题，人人身处其中，厌恶至极，却毫无办法。

作者：吕德文，武汉大学社会学院教授

《年会不能停》可谓是当代职场现形记，也是当今社会的照妖镜，是一部批判现实主义的杰作。毫无疑问，官僚主义形式主义是当前最大的社会问题，人人身处其中，厌恶至极，却毫无办法。

这部影片之所以有力量，不仅在于它敢揭露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恶疾，还在于它也清晰显示了，它提供的解决方案，不仅观众不相信，连创作者自己也不信。

01 官僚主义的诅咒

组织规模大了，就面临管理问题，一旦需要管理，就面临信息不对称，滋生官僚主义形式主义——高管贪污堕落、中层被驯化、基层生死无人管。当组织面临危机时，高管还在想着套现，中层人心惶惶守着一亩三分地，基层则被抛弃。

1998 年的工厂，企业主就是厂长，可以和员工一起共甘苦。30 年后，工厂成了集团公司。企业主成了董事长，和老员工隔了十万八千里。这个十万八千里，由一堆的职业经理人、高管、中层、职员、外包员工构成，工人见不到老板，老板也见不到工人。

所谓现代企业管理，其实就是一套科层化管理体系，它由明确的层级和职责分工、激励和惩罚措施构成。

人们通常认为官僚主义形式主义主要存在于政府机关，是封建落后传统的遗产。现在，人们普遍相信，封建社会的“官场现形记”，完全可以翻版成现代“职场现形记”，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可以存在于政府机关、国企、民企、学校、民间协会等一切组织领域。

可以说，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已经深深刻入了组织的基因里。人们把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归结为落后的封建制度，是因为太相信组织的先进性了，以为现代组织进化可以解决问题。但是，组织再怎么进化，也还是组织；组织进化了，官僚主

义形式主义也可以与时俱进。

人们还习惯把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归结为个别领导作风问题，是要权任性的结果。但是，这部影片告诉大家，官僚主义形式主义恰恰是在各种高大上的理念，无比先进的制度规范以及西装革履的高管里出来了。

一切都那么合理，但一切都那么可恶。

02 悬浮

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最大征兆是它创造了一套自我论证的逻辑，形成了闭环。组织内部有一套话术，所谓的职场黑话，其实就是自己蒙骗自己，自娱自乐。社会的语言腐败，不说人话，装神弄鬼，是这个社会失去效率，华而不实的象征。

本来，互联网大厂是先进生产力的象征，本应提高社会效率，减少损耗。没想到，最大的职场黑话恰恰来自于它们。可见，先进生产力并不必然带来先进生产关系。先进技术可能造福社会，也可能把社会的阴暗面无限放大。

自从有了所谓的互联网思维，赚快钱、快赚钱的逻辑俘获了一大批制造业。实业界出现了一系列的漂浮作风，管理层和工厂已经脱节。管理层在画大饼，在以互联网/金融的思维套现、加杠杆，而基层工厂的利润可能几十年都没变，小老板干的是辛苦钱，工人还是拿那一点只够养家的工资。

现如今，资方和劳动者的关系已经异常复杂。很多干实业的企业家，其实都不太像是剥削者了，因为他们也被资方控制。他们都是凭良心做事，还能够体会到员工的酸甜苦辣。

而真正的资方，以及代表资方的金融机构，往往不会顾忌实业。他们公开质疑“生产得越多就越赚钱么？”，工厂（连同企业家和工人）是可以被收割的韭菜，是随时可以被抛弃的螺丝钉。

当人人都在想搭建平台，人人都想一家独大，人人都要做大做强，人人都靠估值来决定自己的经济行为时，悬浮之风就会弥漫整个社会。而真正的底层逻辑——工人干活赚工资、企业家精益求精获取利润，“一分汗水一分收获”却被无视。

实干兴邦，最不应该出问题的本来是企业界。没想到，职场现形记却告诉大家，实干的社会基础在松动，“干得多的不如说得好的”，这在企业里一样盛行。

长此以往，我们还有希望么？

03 玩弄权术

电影借高管之口，说出了“领导的艺术”。当一个好员工不容易，但当一个坏领导确实很容易。可以说，官僚主义的本质就是玩弄权术，只琢磨人、不琢磨事。在职场，玩弄权术一点都不比官场差，官僚主义登峰造极。

一刀切。“执行不坚决就是坚决不执行”，对待老板绝对忠诚这几乎成了职场准则。领导的命令就是圣旨，领导永远正确，出问题是理解不到位。这也难怪，在企业内部也充满了权斗，拉帮结派，任何一个决策，都要考虑会动哪个高管的盘子，都要考虑谁是谁的人。

一个毫无背景毫无能力的基层工人，就因为被误会为是董事长的人，一路高歌升职加薪。一帮高管和中层如此懂事，完全不用老板哪怕暗示一点，这难道不是现实？

内斗。挑拨群众斗群众，是一个重要的领导艺术。领导不要轻易表态，不要发表倾向性的言论，而是通过暗示，通过模糊性的设问，通过明目张胆的诱惑，让下属分裂，内斗。内斗只是伤了员工的和气，也可能增加了组织内耗，却完全有利于领导把控局势，增加权威。

今天的制度设计，太多规定是建立在人性本恶的假设基础上，典型如排位制、末尾淘汰制度、AB组竞争，在组织内部人为制造内斗，看上去增加了组织活力，其实是伤害了组织的长远利益。

制造不安全感。领导总是有意无意制造不安全感，把考核制度、裁员/优化时时挂在嘴上，让下属时时处于不安全的环境之中，着实是一个驯化员工的不二法门。处于不安全感中的员工，就得想方设法证明自己的价值，哪怕是摸鱼加班，也要卷，无非就是要证明自己的态度。

04 目中无人

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核心表现是目中无人。哪怕是裁员，也要找到一个无比高大正确的词汇——“优化”来替代。本来，裁员是为了组织效率的提高，结果，裁员本身成了目的，裁谁的人，裁什么样的人，都是服务于数字。因此，把技术

骨干裁掉，把创造利润的工人裁掉，留下的却是一帮掌握权力，拉帮结派，拿着高工资的蛀虫。

官僚主义者往往都义正词严，伟大斗争从来都是指向他人，而不是针对自己。“时代的列车开过去，总有人要在车轮子底下增加摩擦力”，他们自己是开列车的人，而其他人都是摩擦力的来源。如此官僚主义，比那些耍耍特权，获得私利的人，更加可怕。

官僚主义的大船之下，没有一个人能够幸免于难。高层在蝇营狗苟，中层惶惶不可终日，基层无人顾及死活。大厦将倾，最容易脱逃的还是高管，而中层注定下沉，基层很可能走投无路。

电影里，董事长眼中还有点人，但他平时也看不见。一帮高管，把技术骨干、基层员工都看作是打工人，都是随时可以被裁掉的耗材。基层工人被看见，是在他们被裁掉，奋起反抗之时。

而他们创造价值的时候，人们却视而不见，这就是时代的悲哀。

05 谁是社会的主人

谁是这个社会的主人？这是我看这部电影的终极之问。

反对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只能依靠人人自觉，以主人翁的心态来对待一切不合理的事情。但今日社会最缺乏的恰恰是主人翁精神——集体荣誉感已经是很久远的事情了，“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口号早就不提了，取而代之的是明哲保身，各自把自己的事情做好。

这部影片的吊诡之处在于，把企业挽救于水火之中的，不是高管，甚至也不是一帮金领，而是没有职级的一线工人，多年未转正的外包员工，以及一个苦苦挣扎的白领。

毫不客气地说，他们没资格当企业的主人，他们甚至连打工人都不算。影片的最大 bug 是，他们竟然为了所谓的理想，残存的良心，以及一点点正义感，就愿意抛弃私利鱼死网破。

九十年代的工人和老板一起，有共同创业的经历，他们之间还有情感链接，工人还残存了一点主人翁的意识。加入 WTO 以后，塑造了完全不一样的企业文化。很多白领是基于绩效考核而选择企业，确实也因经济迅速发展而获得了足够的利

益，表面上看企业没有亏待他们。

过去三十年，是崇尚个人奋斗的年代，经济上行也给奋斗带来正向反馈，这让那一套目中无人的制度泛滥成灾。但在下行时期，奋斗并不是为了获得更多，而是为了安全，为了保持不下沉，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逻辑。

因此，普通人的逻辑都是尽量让自己的利益不受损，不太可能损失自己利益而冒险。

在上行时期，工人们唱着《我的未来不是梦》，那是一种期待。但在下行时期，人们预期不确定，奋斗无望，人们还唱《我的未来不是梦》，只能是怀旧。

人人都有不安全感的时候，企业家和员工还是一条船上的人么？又是谁最先跳船，最容易跳船呢？

【新共产主义】

朱云川著《党的出路》连载五

科学发展观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当前，共产主义运动面临着低潮与复兴机遇。在共产党执政的中国，意识形态被极右势力妖魔化，劳动人民主体被边缘化。共产党人不讲共产主义，人民共和国没有人民，这是很不正常的政治现象。只有正确解读共产主义，打破劳动人民、无产阶级概念上的妖魔化牢笼，才能理直气壮地信仰共产主义，世界共产主义才能真正复兴。有一位老教授说，给党员干部和青年学生讲课，可以讲科学发展观、邓小平理论，讲到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就讲不下去了。如果讲下去，就要把前面的观点完全颠倒过来，内心非常矛盾，面对当前社会的实践需要，不知该怎么办才好？希望本书对读者有所启示和实际帮助。

第一章 立国之本

一 独立自主

——人民者自食其力，劳动者养活人类

人民一词古已有之，一般指平民百姓。在中国古籍中，《管子》有“人民鸟兽草木之生物”，《周礼》有“掌建邦之生地之图，與其人民之数”。在古希腊柏拉图等人的著作中，人民是指具有政治权利的奴隶主和自由民，不包括没有政治权利的奴隶。事实上，奴隶的来源，主要指在战争或暴力抢夺中被俘虏者，因违法犯罪被抓住失去自由的人，也有被强迫的奴工、拐卖的人口、卖身为奴的人。类似的奴隶现象，在现代社会也存在。因此，传统概念中的人民，就是指好人、自己人、大多数人、自食其力的人、独立自主的人，中外皆如此。

人民是一个历史的、政治的范畴，其主体始终是从事直接劳动生产的劳动者，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历史时期，人民概念有不同的内容。然而，这种“好人、自己人”的传统概念，完全由统治阶级说了算，对自己有利就包括在人民之中，对自己不利就开除出人民队伍，主

观随意性大，具有相对性，因而不科学。因此，有必要对人民的基本属性作一下探讨。

第一，人民首先是人，是真实的自然主体，这是人民的自然属性。人民是自然人，具有自然主体性。古人说“食色，性也。”每一个自然人都有真实的基本需求，人民也有真实的基本需求，比如吃喝拉撒、衣食住行、柴米油盐等等，都是正当合理的，合于自然法则的，神圣的，其他人不可代替的。因此，人民不同于现实人和虚拟人的概念。满足每个自然人的基本生存需要，比如吃饭睡觉、婚姻制度、自由快乐等，都代表着人民的自然大道，社会的实践真理，政治的行为准则。

第二，人民是人类的大多数，这是人民的社会属性。老子说：“贵必以贱为本，高必以下为基”。不管统治阶级愿意不愿意、给予不给予人民以政治上的“人民主体”、“自己人”承认，承担着创造人类财富的从事直接劳动的人民始终是大多数，这是否定不了的铁的事实。江海由小水滴汇流出来，高山由沙土堆积起来。正是人民在数量上的大多数，每个人创造出来的财富哪怕很少，微如尘埃，积累起来就是一笔巨大财富，劳动人民才会成为被统治阶级占有与掠夺的对象。

第三，人民自己养活自己，这是人民的文化属性。正因为人民是大多数，没有谁能养活人民，所以人民必须自食其力。劳动创造人类世界，人类社会所有的物质与精神的成果，都是由脚踏实地、诚实认真、埋头苦干的劳动人民创造出来的。只有劳动人民的有益社会劳动，才是创造财富的真正源泉。那些善于花言巧语、巧取豪夺的统治阶级及邪恶势力，对劳动人民创造出来的社会财富，始终着眼于垄断、掠夺、侵占、瓜分、独享等，它们不可能为人类创造真正的社会财富。因此，马克思说“劳动是每个人的本份”，共产主义的根本任务，就是保障劳动创造财富的源泉不受侵犯永不枯竭。

第四，人民养活全人类，这是人民的经济属性。人类社会没有直接劳动，连一天都持续不下去。人民是自然本能和社会需要相结合的实践范畴，承担着养活全人类的全部直接劳动。在人类社会中，组织优化、商业流通、社会管理、成果占有、武装保卫、财富分配、生活享受、主观感受等必要环节，从本质上说都不创造新的社会财富。因此，人类历史不是由某个帝王或少数精英人物创造的，只能是由广大劳动人民创造的。劳动人民是人类社会的直接创造者，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社会需要劳动人民共建，成果应由劳动人民共享，这是符合天下道义的自然法则，就是科学发展观的以人为本。

第五，人民是独立自主的好人，这是人民的政治属性。人民是世界的创造者，也是历史的继承者。无论光明还是黑暗，和平安宁还是深重苦难，人民都是人类命运的直接承担者，任何代价都得由人民来承担。人民的命运，其他任何人都不可能代替，神仙或皇帝也不行。

真正的人民没有退路，不可逃避也无处可逃。人民必须坚守天下道义，不能欺压别的人民。一旦欺压别的人民，就与邪恶势力一样。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只能依靠人民起来解放自己。人民领袖是在人民追求独立自主的革命实践中产生出来的，是人民中的一员。人民领袖也不能代替人民作主人，只能帮助人民去解放自己，实现人民自己的命运。只有解放了全体人民，人民领袖的使命才算结束，才能获得最后解放。

传说中的桃花源，那是极少人的精神避难所，劳动人民在那里不受官府邪恶势力欺压，过着自由愉快的田园生活，也必须坚守道义，自食其力，捍卫和平，不能依靠欺压别的劳动人民过活，人民依然承担着自己的命运。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人民除了反抗一切压迫者外，根本没有向其他人群转嫁灾祸的任何可能。在现实社会中，人民只能通过诚实劳动去建立和保障自己的生活、通过拼命抗争去保卫和巩固自己的成果——物质的与精神的社会财富。所有那些弄虚作假、胡说八道、转嫁灾祸、欺压人民的人都不是好人，也就不属于人民中的一员。

毛主席说：“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所谓人民，就是自食其力的老实人、独立自主的自由人、天下道义的实践者、能够为自己生活付出诚实劳动的人、能够为人类命运付出奋斗牺牲的人们、符合天下道义的人类大多数人、具有真实的自然主体性的人群。概言之，人民具有以下五大属性：自然主体的自然属性、大多数人的社会属性、自食其力的文化属性、养活人类的经济属性、独立自主的政治属性。一句话，自然主体是人民的本质属性。

二 道德觉悟

——人民是道义化身，圣人为人民代言

人民是天下道义的化身，圣人是人民的代言人，人民领袖是人民的代表者。圣人与百姓的心是相通的。老子说“圣人恒无心，以百姓之心为心”、“大智若愚”、“返朴归真”，都是指圣人与普通老百姓一样，都具有人民的道德属性。这个概念，老子与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完全一致的。人民利益就是天下道义，能知行合一者，谓之道者；能功成事遂者，谓之圣王，就是人民领袖。因此，人民觉悟在于行道中，人民领袖成于大道中。

在中国古代文化中，人和民不是同一个概念。在老子思想中，因为认识真理的深浅，人与人之间存在差异，比如上士、中士、下士、圣人、君子、众人、民、百姓等。其中，圣人（上士、君子）和众人（中士、下士）是人，指有道德觉悟的人群；民和百姓是民，指未有

道德觉悟的人群。在孔子思想中，因为社会身份的不同，人与人之间存在等级，比如圣人或君王、君子、小人、愚民等。其中，身份高贵的圣人或君王、君子是人，身份卑贱的小人和愚民是民。

老子说“故善人者，善人之师；不善人者，善人之资”。这里，“人”主要指自然人、天下人、人格、人道、政治，与“人”相关的有圣人和众人。所谓圣人，是指有彻底觉悟的善人，是具有完全人格的真人、好人、自然人。所谓众人，是指具有知识缺陷的不善人，具有不完全人格的现实人。在老子思想中，善人，指对自己对他人对社会都有好处，没有道德缺陷的好人。不善人，指对自己对他人对社会都有坏处，具有道德缺陷的坏人。善人与不善人，都是文化概念，主要指道德观念。现实人，就是指广义的社会人，一般使用“民”、“百姓”的概念。

因此，“民”就是指没有多少文化与道德觉悟的老百姓、处于社会下层自食其力的劳动人民。一般来说，老百姓没啥自己的道德观念，有也是模仿别人或统治阶级的，谈不上善人与不善人，表现得不好不坏。大多数老百姓都是诚实善良的，凭劳动吃饭，凭良心说话。在现实社会，大多数老百姓没有受到太多的精神污染，尽管有时会耍一点小聪明，做一些欺骗别人的小事，主要方面还是好的。

从伦理道德来说，人民就是有政治觉悟的自己人。以天下道义为准则，有精神追求的知识分子、处于社会高层的统治阶级，就是“人”，代表天道的文化人格，具有独立自主的特征。以政权认同为准则，没有精神追求的老百姓、处于社会中下层的普通劳动者，就是“民”，代表人道的政治人格，具有人身依附的特点。在天道与人道的基础上，“人民”就是文化人格与政治人格相结合，是谓“天人合一”。所谓人民，就是指天道与人道合一、文化与政治合一、人格与国民合一、知与行合一。因此，有道德觉悟的劳动者就是人民。

从自然道德来说，人民就是有道德觉悟的好人、有共产主义觉悟的革命者。只有把人道政治，最终确定为王道政治，才能得到真实自然的人民概念。真正的人民概念，包括有人民觉悟的劳动者、人民领袖、一心一意为人民服务的其他人群。

真正的人民概念有两大特性：一是原则性，人民不能是坏人。好人就是好人，坏人就是坏人。在社会成员中，排除极少数的坏人，大多数就是能够自食其力的人民。二是变动性，现实人具有两面性。好人可能变成坏人，坏人可能变成好人。任何人只要说坏话干坏事，就不再是人民中的一员；任何人只要能够彻底改正错误，又可以回归人民中来。

那些贪官污吏、黑恶势力、弄虚作假、欺诈奸邪、与人民为敌的人，都已经脱离人民，不再是人民中的一员。就是说，脱离人民群众的官僚主义者、危害人民群众的腐败邪恶势力，

极左极右都是人民的敌人，就是共产党的敌人。因此，代表人民利益的共产党，必须始终反对极左极右、反对腐败邪恶，是有真实依据和现实必要的。极左只有彻底改正错误，极右只有彻底改邪归正，才能重新回到人民中间来，才能得到人民的宽容和欢迎。混世派是不觉悟的群众，也不算人民。从真正的人民概念，这就是党始终要反极左、反极右、反混世、反腐败、反邪恶的道理。

圣人和人民领袖是人民，真正的老实人和共产主义者是人民，大多数人也是人民。为什么是大多数人呢？因为一小部分人知错不改、邪恶难改，顽固不化死硬到底，坚持与人民对抗；还有一小部分人为谎言所欺骗，为利益所诱惑，为邪恶所收买，甘愿替法西斯卖命，与邪恶势力同流合污，成为助纣为虐的爪牙帮凶，坚持与人民为敌。大多数老百姓的思想可能一时被蒙蔽，由于人数众多，收买不了也不可能收买，因为邪恶势力要掠夺和侵害的对象，就是占大多数的人民群众自己。因此，邪恶势力对于大多数老百姓，只能采取欺骗的方式，而不可能采取收买的方式；只能采取威胁的方式，而不可能采取镇压的方式；收买与镇压只能得逞于一时，而不可能得逞于长久。否则就是无利可图，邪恶势力不仅没必要去折腾，反而越折腾自己失败得越快、失败得越惨。

现实社会是很复杂的，有各种各样的人，比如真实自然的圣人、完全人格的真人、对人民有利的善人、对群众有害的恶人、自食其力的老实人、见义勇为的侠客、为人本分的正人、知恩图报的好人、好走极端的邪人、偷奸耍滑的奸人、片面化的畸人、口是心非的伪人、表面不一的虚人、忘恩负义的坏人、欺软怕硬的软蛋、见利忘义的小人、喜怒善变的两面人，等等。在现实社会中，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好人坏人往往难以分辨。如何判断好人坏人呢？有两种办法，具体地说：

其一，正确办法叫“先知先觉”。就是“听其言、观其行”，以天下道义为标准做判断。言行符合天下道义的，就是好人；言行违背天下道义的，就是坏人。这个办法完全合理，真实有效。只是需要有一定的理论水平，具有孙悟空一样的火眼金睛，一般人理论水平有限能力达不到，适合于有人民立场和共产主义觉悟的人民群众。

其二，简单办法叫“后知后觉”。就是以对圣人和人民领袖的态度及实际后果做比较。真正崇敬圣人和人民领袖的，实际后果好的，就是好人；故意丑化圣人和人民领袖的，实际后果坏的，就是坏人。在当代社会，比如崇敬毛泽东的、做好事的就是好人，丑化毛泽东的、干坏事的就是坏人，这就是老百姓判断好人坏人的简单办法。这个方法简单有效，但不太合理。

因为，坏人可能一时伪装成好人，拌一点甜言蜜语，裹一些糖衣炮弹，老百姓对于伪装

成大好人的坏人，比如王莽之流的伪精英，如同唐僧一样的肉眼凡胎，是不容易看得穿识得破的，往往同情坏人或拥护坏人，为坏人作辩护，需要吃亏上当后才有所觉悟。在现实社会中，如何做到不冤枉好人、不放过坏人呢？要根本解决这个问题，除了“真学、真懂、真信、真用”科学发展观，做一个有人民立场和共产主义道德觉悟的人，别无更好的办法。因此，加强理论学习，建立学习型社会，不仅是共产党人的需要，也是人民群众自身的需要；不仅是中国人民的需要，也是世界人民自身的需要。

三 自然人权

——人权来源于人民，与统治意志无关

所谓人权，简单地说，就是指做人的权利。人的权利来源于自然人本身。有做人觉悟的自然人，才具有这种权利意识，才有人权的概念。换句话说，未有觉悟者连做人的想法都没有，是没有什么人权可言的，就算给他也不会珍惜。因此，人权不是人类的权利，只能是人民的权利。唤醒人民群众的人权意识，就是共产主义者对人民群众的启蒙教育。中国人认为，人民的自然主体性表明，人民的权利是自然真实的本身就有的，称为“自然人权”。西方人认为，个人的权利是上帝给的，个人的生命就是上帝创造出来的，称为“天赋人权”。

有人问，“人民是谁养活的？世界是谁创造的？”右翼回答说，人民是上帝创造的，人民是上帝养活的，人民是奴隶主养活的，人民是资本家养活的，人民是皇帝官僚养活的，人民是国家精英养活的，这些都是没有事实依据的谎言。其实，上帝只是人类创造的一个文化概念，奴隶主、资本家、皇帝官僚、国家精英，统统都是由劳动人民创造的社会财富养活的。一句话，劳动人民养活全人类，世界是劳动人民创造的，人民自己养活自己。

为什么右翼不顾历史事实打胡乱说呢？那是因为人民的自然主体性被抛弃，人民的主体地位被颠倒，人民长期被虚置被右翼妖魔化，加上大多数人的认识糊涂与极少数人的故意欺骗，右翼的奇谈怪论就拥有了“市场”——存在的就是合理的，越是荒谬的就是合理的，这就是右翼所说的合法性来源。这里，让我们分析一段摘自互联网的文字资料，“只有把人民请下神坛，才能真正保护人民”，看看右翼是如何以假乱真、把邪恶扮成天使、让谎言变成真理的。右翼人士如是说：

在我们所受的教育中往往是告诉我们“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人民创造历史”，人民几乎就是上帝，是完美的，不容置疑的，只要是以人民的名义，我们可以做任何事情而不受指责。但是以基督教为底蕴的英美文化中，人民固然也是伟大的，

但是这个词并没有到达不能受到质疑的神圣高度，因为很显然人民是属于人世的范畴，不具有神性，人民终究不是上帝，人民也可能犯错误，也可能意见和利益无法统一，也可能有私心，也可能被煽动家所迷惑，也可能会充当牺牲品，林肯提出了民有，民治，民享，但也同时加了一个限定词 Under God(在上帝之下)，这个上帝是干什么用的？很多东方人不理解，其实这正是西方文化的核心秘密，这个上帝就是制约人民的。上帝给每个人的基本权利谓之天赋人权，弗特林也好，辛普森也好，都有这个上帝给予他们的权利，这些权利被视为自然法而成为美国宪法和整个法律体系的基石，所以，不管人民如何讨厌弗特林或辛普森或任何一个人，人民都永远无权剥夺他们的基本权利，因为这是上帝赋予每个人的，如果特林或辛普森等因为这种权利而战胜了人民，人民也必须接受，因为人民不能不服从上帝。正是这种把人民放置于神之下的英美文化才保护了每一个个人，而每一个个人加起来，不就是人民吗？这就是西方的智慧。

在这一段文字里，提到“自然法”是美国宪法和整个法律体系的基石，因此只要把“上帝”换成“自然”概念，就是老子《道德经》的观点。如前所述，科学发展观的自然（本体）、本能、本性，是本末有序三位一体的；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运动、物质，是本末有序三位一体的；中国文化的自然人、理智、欲望，是本末有序三位一体的；基督教神学的上帝（圣父）、精神（圣灵）、基督（圣子），也是本末有序三位一体的。因此，在自然逻辑上，自然、世界、自然人与上帝是同位概念，在逻辑地位上是平等的。问题在于，上帝与自然就是同一回事吗？当然不是。

在中国文化概念中，上帝，上地，以地为上，地道至上也。归于鬼神之道范畴的上帝，是崇拜本能、重视器物、放纵欲望、物质第一的理念产物，所以在中国又称为玉帝——欲望之神。玉者，欲也，浴也、女也，就是老子所说的“谷神不死，是谓玄牝。玄牝之门，是谓天地根”。美国的自由女神，就是指自由的欲望之神。许多右翼只知道自由女神是个女的，却不知道为什么是个女的，其实来源于老子《道德经》思想。正如中国戏剧把玉皇大帝扮成男人，不知道其真身是女人，是个女身男相的女权主义者。

“玉帝”名号信仰，始于中国南北朝，盛行于隋唐，与魏晋玄学的影响不无关系。玄学“越名教、尚自然”，源头在于老子《道德经》。事实上，只要与现实生活中的女人，代表阴柔、宽容、金钱、物质、享受、欲望、自私、非理性、鬼神意识等右翼特性联系起来，就知道“玉帝”的真实含义。中国古代神话中，主管上天的，称为上帝、天帝，这是指自然神，文化神。玉帝，就是中国社会以男性为主的观念标志。

正如老子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政治人道以经济地道为基础，经

济地道以文化天道为基础，文化天道以大道实践为基础，大道实践以自然世界为基础。因此，比地道更高的是天道，比天道更高的是大道，比大道更高的是自然。

中国人的上帝，是一个文化天道概念；西方人的上帝，是一个经济地道概念。也就是说，中国人的上帝，是人类劳动实践与文化发明的产物；西方人的上帝，是人类劳动实践与经济利益的产物。比这两个“上帝”概念更高的，就是自然人的实践大道，它就是自然人本身，也就是劳动人民。在自然人的前面，就是最高标准的自然。无论是中国人的上帝，还是西方人的上帝，都是人类实践的社会产物，也就是说，上帝归根到底是一个人造的概念。毕竟，谁创造了上帝概念？是人类文化；谁创造了人类文化？是人类的大道实践；谁创造了人类，是自然。

因此，人民是人类中的一分子，都是自然的产物。“每一个个人加起来，不就是人民吗？”错也。每一个个人加起来，叫人类；每一个有道德良知的自然人加起来，叫人民或好人。没有道德良知的人，叫群众；违背道德良知的奸诈邪恶者，叫坏人。因此，人民必须都是好人。知晓好歹不干坏事的人，叫人民；不知晓好歹而盲目做事的人，叫群众；知晓好歹而干坏事的人，叫坏人。

人民与上帝没有关系。上帝不是用来制约人民的，而是用来帮助人民的，只是为人民服务的概念工具。在人类社会，所谓统治，不外乎文化统治（天道）、经济统治（地道）、政治统治（人道）、鬼神统治（迷信）。如果这些“上帝”反过来统治人民，那就是社会异化的不自然现象，就是人民需要起来反抗的压迫者，以谋求人民解放。因此，人类不在上帝之下，人民在上帝之上；人类是上帝的创造者，人民才是上帝的上帝；人民不仅在上帝之上，而且在上天之上；人民比上天还高，比上帝更神圣；人类是自然的儿女，人民是大道之真人。圣人与人民一样，是人民的代言人。

人民唯一真正敬畏的，就是自然本身。人民还不是至高无上的，比人民更高是自然。圣人和人民领袖也有可能认识失误，人民和全人类也有可能实践犯错误，圣人、人民领袖、人民、全人类同样可能犯错误，都需要实践少犯错误，需要认识服从自然真理，以大道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终极标准就是自然本身。就是说，人类想要在认识与实践中的不犯错误少犯错误，只有一个共同的终极标准，叫做“道法自然”。彻底解放思想的唯一办法，就是真正做到“道法自然”。

关于自然人权与天赋人权的来源之争，并不是文字口舌之争。争论人权来源的逻辑前提，就是肯定人权的自然真实性。既然承认人权的真实存在，它就应该与人类同在，而与一切统治者的意志无关。

如果相信“天赋人权”，人权来源于西方人的最高统治者——上帝，而作为鬼神的上帝又是无法真实证明的，只是出于传教士或统治者之口，就意味着人权没有真实可靠的来源，人权是不真实的因而是可有可无的，它完全来源于统治者的利益需要，“让你有利益，你就有人权；让你没有利益，你就没有人权。”这就是“天赋人权”的不彻底性与虚伪性。“天赋人权”出于利益需要，就是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极右邪恶势力，在全世界穷兵黩武掠夺侵略的根本原则。由此可见，右翼关于“天赋人权”的观念，是错误的而虚伪的。

实际上，只有承认自然人权，人权来源于人类自身，才能与一切统治者的意志无关。无论统治者承认不承认，因为人类是真实存在的，人权与人类同在，人类自身就是人权的真实来源，无需什么神秘的鬼神来安排。在这个意义上说，人民就是有这种自然人权觉悟的人。“一切权力来源于人民，一切权力属于人民！”这不是一句空话，而是一句真理。这就是马克思主义者坚持无神论、反对鬼神论的根本原因，也就是发动人民革命、建立人民政权的权力来源。

当前，面对西方邪恶国家的强势话语权，面对美帝国主义对人民的疯狂进攻，探讨一下人权与主权的关系问题，对于解开捆绑在人民身上的道义绳索是十分必要的。

右翼说“人权高于主权”，人权是西方上帝赋予的，神圣不可侵犯，叫做天赋人权。右翼的自由主义者，打着人权旗号随意干涉别国主权，不是在为别国人民带来幸福，而以自身利益为根本目的，是邪恶势力的主动进攻。左翼说“主权高于人权”，民族不独立，国家不富强，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得不到基本保障，人民失业找不到工作，即使想安分守己做个奴隶都难，还有什么人权可言。左翼的国家主义者，坚持民族主权意识，坚决捍卫国家主权，保障人民的基本生存权，这是天下道义的被动应战。

那么，人权与主权关系的正确解答是什么呢？自然人权高于国家主权，人民人权高于非人民特权。凡是非人民的都是少数人的特权。在共产主义社会，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人民的权力至高无上。人民权力等同于国家主权，人民人权与人民主权是一致的。当人民权力被抛在一边，国家主权也面临着深重危机。因此，人民权力高于非人民权力，人民主权高于非人民主权。在现实社会中，代表人民利益的就是好人，代表邪恶势力的就是坏人。坏人不讲真正的自然人权，只讲自己想要的天赋特权。因此，人民主权高于坏人主权，人民人权高于坏人特权，不分好坏的“人权高于主权”抽象命题不成立。

解决问题的唯一途径，就是从历史事实出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极右对邪恶势力的支持，都是反对人权谋取私利的丑恶表演，比如支持中国的台独、民运、藏独、疆独等势力。美帝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主权，就是压迫人民谋取特权的邪恶工具，比如美国侵略巴拿马、阿

富汗、伊拉克、利比亚等国家。因此，作为邪恶势力的代表，极右对于人民历史颠倒是非黑白，邪恶国家对于全世界犯有反人类罪，是没有任何自然资格奢谈人权与主权的。

四 为政之本

——人民国家人民本，当家作主老实人

一个国家政权最可宝贵的因素是人民。古人说“民乃为政之本”，是指政权基础。一个国家政权，必须有一大批拥护和支持自己的人民，否则就有生存危机。或者没有群众基础难于立足，或者失去群众基础难以长久。一旦出现内忧外患，缺乏群众基础的国家政权就要很快解体完蛋。

然而，在一切非人民性质的国家政权里，奴隶主暴力统治的奴隶社会、资本家垄断统治的资本社会、帝王官僚统治的封建社会、国家精英代理的社会主义社会，人民只是被统治压迫的国民主体，不是拥有民主权力的政权主体。在一切非人民性质的国家政权里，统治阶级均以占有劳动人民的生命财产为目的，无视劳动人民的自然主体性，更不会自觉与人民分享思想、权力、财富、快乐。因此，国家由广大人民群众来建设、财富由极少数统治阶级来享受。一个国家政权是不是人民性质的，可以从是否具有“共建共享”这个特点加以判断。

只有王道政治，才是人民共和国的主体，这是有着圣王人格的人民领袖对人民群众的一种政治承诺，是一种人民意志的国家体现。中国历史上圣人奉行王道，比如商汤革命、文武革命、文景之治、贞观之治等，都离不开重视人民为本，人民乃王道之本。事实上，共产主义并不神秘，也不渺茫，只要做到以人民为本，领导干部与人民群众同心同德，共同把国家真正建设好治理好，让社会实现公平、公道、公正，让人民有劳动、人格、尊严，这就是人民群众所需要的共产主义社会。温家宝总理说：“政府的一切权力都是人民赋予的，一切属于人民，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一切归功于人民。必须秉持一种精神，这就是公仆精神。”因此，人民国家由人民群众共同建设，社会成果由人民群众共同享受，这就是共产主义的社会理念，是占 99%以上的人民群众所需要的基本利益。

真正的人民概念，不同于子民、平民、公民、臣民、国民等概念。所谓子民，是指在原始社会具有血亲、姻缘、情感、伦理等特定关系的人群。所谓平民，是指在奴隶社会战胜者一方的自己人，失败者一方沦为奴隶。所谓公民，是指由社会财富、地理环境联系起来的人群，比如资本主义社会。所谓臣民，是指通过战争暴力、土地资源等方式控制的人口，比如封建社会。所谓国民，就是指由国家行政与法律认可具有国籍资格的人，比如社会主义社会。

无论宗教社会的子民、奴隶社会的平民、资本社会的公民、封建社会的臣民、社会主义的国民，无论是否使用“人民”这个字眼，都不具有人民的全面内涵，不是真正的人民概念。因此，具有自然主体、大多数人、自食其力、养活人类、独立自主等五大属性的人民概念，只能出现在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中。可以说，没有共产主义理念，就没有真正的人民概念。

1957 年，毛主席在《事情正在起变化》文章中说：只要有人群的地方，就分左中右。先进分子是左派，是好人，约占 5%；落后分子是右派，是坏人，约占 5%。人民群众是中间派，是不好不坏的人，约占 90%。人民群众数量在 90% 以上，只是大概估算。一般来说左比右好，极左极右都不好。这种划分有一定随意性，存在不合理的地方。比如，对先进与落后的判别缺乏真实标准，只要是自己人就是先进的，只要是异己者就是落后的；左派、右派争夺对群众的领导权，都有可能对群众实行官僚统治，不一定能真正代表广大群众的利益。这与共产主义革命者追求真理、正义、公道、平等的理念不符合，也难以真正实现两个彻底决裂。

实际上，人民就是自然派，党员代表先进分子，是坚持自然真理、实事求是、人民利益的守中派；极左极右代表落后分子，是坚持极端、违背实事求是、损害人民利益的极端派；左右翼群众，是或左或右、时左时右的中间派，是容易被人欺骗、遭受侵害的劳动群众。只有这种划分，党的守中派、人民的自然派、群众的左右派，才可能在人民利益同一个标准上实现重迭，因而共产党就能够真正做到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同时，极左清谈误国的教条主义、极右损人利己的邪恶言行相对明确，使追逐名利的极左极右，与未觉悟的左右派群众区别开来，极左极右失去对群众精神的挟持与控制力，就会因失去群众基础而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人人得而伐之。

老子说：“天下神器也，非可为者也。为者败之，执者失之，同者得之”。胡作非为的人会败坏政权，武断专制的人会丢失政权，只有与人民群众保持一致，才能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与支持，才能够赢得政权，就是天下道义的自然法则。从本质上说，共产主义革命就是一场追求真理、坚守道义的文化革命、思想革命。用天下道义去宣传群众领导群众，反对极左的错误认识与极右的歪理邪说，就是共产主义革命者的真正使命，也是实现两个彻底决裂的正确途径。

这里，90% 与 99% 的估算，哪个更合理呢？左派不等于极左，右派不等于极右，极左极右大约占左右派的 10%，也就是约占总人口数的 1%，在网络调查中结论基本成立。可以说，对于人民群众的自然主体来说，不包括左右派的占 90%；对于合理驾驭左右的统一战线来说，不包括极左极右的占 99%。

在兴国网-中国文化通讯社网站，关于“共产主义”的一项网络调查显示，目前赞成共产主义者占 59%，赞成社会主义者占 19%，不选择者占 7%，赞成资本主义及其他者占 15%。在网上支持笔者的共产主义观点，送鲜花的网友约占文章点击数的 10%，基本上代表着有觉悟的网民意见，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中国社会的意识形态状况。可以估算一下，2011 年中国总人口约为 13 亿，有 4 亿网民，未上网的算作群众。在 4 亿网民中，认同人民立场者 $4 \text{ 亿} \times 10\% = 4 \text{ 千万}$ ，约占目前党员数量的 8 千万的一半，不上网不关心政治的党员算作群众。因此，目前中国有觉悟的人民 $4 \text{ 千万} \div 13 \text{ 亿} = 3\%$ ，再按得票比例计算，极左占 0.9%，极右占 0.7%，未有觉悟的群众占 95.8%。

按投票结果计算，支持人民派有 $(4 \text{ 亿} \div 13 \text{ 亿}) \times 59\% = 18\%$ ，同理，支持极左派有 5%，支持极右派有 4%，有 75% 的人处于沉默与观望状态。因此，支持人民群众有 91%，支持极左极右有 9%，与毛主席认为左派与右派占 5%、中间派占 90% 的估计接近，表明估算方法基本可行。实际上，极左与极右本身为极少数不到 2%，支持率合占 9%；人民群众本身占 98% 以上，支持率仅占 91%，表明还有一部分群众站在自身对立面，思想是被异化的也是糊涂的。换句话说，极左极右对群众终究有一定市场约占 7%。

因此，不同的人群具有不同的阶级立场与阶级利益，出台一项国家政策，不可能让 100% 的人满意或受益。只要能让 90% 以上的人满意或受益，就算是一个符合人民利益的好政策，就能得到大多数人的拥护而顺利执行下去，从而造福于社会大众。在现实中，因为群众具有两面性，人民本身在数量上也是变动的，不宜以 5% 强制划分左右或好坏。只有以天下道义为标准来做判断，才能够准确区分出来，不会发生“反右扩大化”的悲剧。

只有共产主义社会，人民才是政权之本。只有坚持人民利益高于一切，以天下道义为核心准则，充分尊重人民群众的文化权益、经济权益、政治权益、生活幸福，人民才是政权的主体。因此，人民是人民国家的主体。所有的人民革命家、人民企业家、人民哲学家等，必须与极左极右等危害人民的传统理念实行彻底决裂，共建社会共享成果，捍卫人民政权，是人民共和国的人民群众不可推卸的神圣责任，也是不可侵犯的神圣权力。因此，人民国家要真正为人民服务，必须切实履行好文化、经济、政治、社会等四项基本职能，具体地说：

第一，坚持文化指导，追求真理，捍卫真理，这是人民国家的首要原则。文化，就是人类社会一切权力概念的依据。大道即真理。真理是人民的依据，发现真理是每一个自然人的权利，而不是个别领导人的专利。科学是接近真理的方法。只有科学理论具有了真理的属性，它才会停下来与真理融合在一起，与人民融合在一起。邪恶势力想要欺压人民群众，第一步就是从文化上出手，只有搅乱人民群众的思想，邪恶势力就有了藏身之所，就有源源不断的

后备力量。因此，人民国家的第一条，就是做到理论彻底性，让人民与真理融为一体，从而得到真理的保护，这就是人民权力的第一法则。

第二，促进经济发展，满足人民的基本生活需要，这是人民国家的主要任务。人民基本需求不可代替，满足人民的基本需求是正当合理的、天经地义的。只有充分满足人民基本需要的发展，才是全面发展。只有真正遵守和维护天下道义的行动，才是协调发展。只有适当地节制发展，保证人民一代代生存延续下去的发展，才是可持续发展。任何人损害人民利益，人民就是要反对的，也是不可持续的。因此，坚持科学发展是具有人民性的好事，违背科学发展是具有反人民性的坏事。

第三，维护政治稳定，保障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这是人民国家的可靠保障。人民是国家政权的基石，没有人民群众拥护和支持的国家难以持久，也经不起外敌入侵。人民是天下道义的化身。团结一致、组织起来、为满足人民的基本需要扫清障碍，就是革命者行动的起点。反抗压迫、英勇战斗，铲除任何危害人民的邪恶势力，就是革命者行动的目标。

第四，实现社会和谐，保障人民群众的生活幸福，这是人民国家的再生能力。老子说：“和大怨，必有余怨，焉可以为善？”和谐社会不是依靠国家强力一时实现的，而是通过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来实现的。制订国家政策服从人民需求，而不是人民服从国家领导人意志。要听取人民群众意见，密切关注人心得失，任何不稳定因素都要及时从根本上化解。不符合人民需要的国家政策，是应该尽快加以改正的。让人民自己作主，而不是代替人民作主，这才是为人民服务，才是人民幸福的基本保障。国家的可持续发展，政权的长治久安，必须做与人民群众的幸福生活息息相关。一切发展都必须真正以人民群众的生活幸福为核心，实现人民幸福才是人民国家政权的最终目的，也是人民国家长久生命力的表现。

长期以来，我们党主要重视经济基础与政治制度的职能，忽视了文化核心和社会目的的职能，既迷失了根本标准，也丢失了最终目标，无的放矢，长期乱作为，所以年轻的人民共和国六十年来步履维艰，极左极右的瞎折腾不少，广大人民群众也不满意，这正是传统观念中的认识不科学、思想不全面、理论不彻底、发展不合理所造成的严重不良后果。由此可见，“真学、真懂、真信、真用”科学发展观，实现人民共和国可持续发展，理论彻底化是何等重要的时代任务啊！

五 主权在民

——执政党脱离人民，祸国者必亡天下

在中国历史中，人民的概念，最早出现在距今 4000 年前的黄帝、颛顼（zhuān xū）、帝喾（kù）、尧、舜的五帝时代，相对于“人民”概念，是“天子”名号的使用。司马迁在《史记·五帝本纪》中说：“於是帝尧老，命舜摄行天子之政，以观天命。”而夏、商、周三王时代的君主，也称天子。特别是西周，就是有文字记载的信史了。在春秋战国以前的中国社会，是以公有制为主的国家体制，就是军事化等级制的奴隶社会。从夏朝“家天下”开始的中国社会，就是私有制出现，秦以后就是私有制为主的帝王体制。事实上，夏朝主政治杀伐，商朝主经济财富，周朝主文化周全。公有制与军事战争相关，以政治人道为核心，政治私有，夏朝实行过；私有制与社会财富相关，以经济地道为核心，经济私有，商朝实行过；共同制与人民幸福相关，以文化天道为核心，文化共同，周朝实行过。

在原始社会早期，没有“官民”内涵，也没有人民的概念，只有“一家人”的意识。在原始社会晚期，不同氏族部落之间经常发生战争，在相互兼并融合的过程中，产生了大量的俘虏与财富，出现了社会公共管理职能的需求，也就形成了官员与平民、人民与奴隶的不同社会内涵。权力掌握在巫师和长老手里，来源于对鬼神的解释，只有鬼神与子民的说法。在这个时期，人在精神上对鬼神依赖性大，在物质上对集体依附性大，大多数人都有做“自己人”不做奴隶的意识，这就是人民概念的萌芽。

在奴隶社会，建立了正式的国家体制，出现了专职的政府官员，也有了国民的概念。奴隶主手中的权力，来源于军事战争的胜利，不再来源于鬼神，所谓“人定胜天”、“枪杆子里出政权”，就是这个意思。在奴隶社会中的人民，主要指奴隶主和平民百姓。平民百姓是一种自由人身份，拥有名义上的权力和财富。在由等级特权和财富多寡决定一切的奴隶社会里，平民百姓的权力财富几乎等于零。“人民”被代表了，权力完全掌握在奴隶主手里。

或许有人问，奴隶社会消亡至少几百上千年了，讨论它有啥意思呢？非也。一场较大规模的战争失败，国家就可能回到奴隶社会，比如美国侵略阿富汗、伊拉克、利比亚，这些国家失去了独立自主，沦为帝国主义的新殖民地，相当于奴隶社会状态。奴隶社会作为制度，至今也没有完全消亡，奴隶现象在今天依然存在。事实上，奴隶身份大量来源于战俘和罪犯，也可能来源于无辜的受害者，他们被暴力强制剥夺了人身自由、生命财产、政治权力，被用作从事各种苦役的工具。奴隶仅仅是作为奴隶主的私有财产和劳动工具，只是被当成牛马和奴仆，不被当人看待，没有人格也没有尊严，不是人民中的一员。因此，在奴隶社会中，构成人民主体从事社会劳动的平民与奴隶，没有真正的政治权力，无法表达自己的自然人权——除非选择造反，才可能获得自身的解放！

实际上，革命战争的暴力专政与奴隶社会的发展规律具有同一性。资本社会前身不是封

建社会，而是奴隶社会，也就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原始积累时期。从封建社会向着资本主义社会过渡，必然要经历一场残暴、血腥、肮脏的奴隶社会复辟，然后由战争胜利一方的奴隶社会状态，重新走向社会改革的资本主义社会。由资本主义向着封建社会过渡，是可以和平实现的，这是一个政治改革与治理整顿的过程，节制资本的魔力，抑制经济的掠夺性增长，这是一种社会进步而不是一种社会复辟。这个观点完全符合历史规律与社会现实，与传统教科书中的经典理论有所不同。

在资本主义社会的话语中，只有公民，没有人民。公民只是一种定期纳税和选择投票的工具，没有道义可讲。在封建社会的话语中，只有臣民，没有人民。臣民就是那些受到帝王家（大家族势力）、政府大小官僚压迫的草民，没有权力可讲。在社会主义社会的话语中，只有国民，独立自主的人民也不存在，没有真实可讲。由于国家社会主义的精英“代理制”的虚伪性，公共权力被广泛滥用，人民主权被普遍轻视，许多公共事业人民无权参与，公共事务人民无权过问，也无从知晓，人民地位被虚置、人民利益被代表，人民思想被扭曲，人民意志被强奸，大多数国民的权力被边缘化，真实的人民权力也不存在，结果就是“人民为公仆服务”。

综上所述，人类历史上的原始社会、奴隶社会、资本社会、封建社会、社会主义社会，都是人民没有觉悟、没有权力、没有地位、没有财富的不合理社会，需要与这些“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彻底决裂。事实上，在一切非人民性质的国家政权里，人民范畴的大小，完全决定于统治者权力意志和是否有利的实用主义，也就是“自己人”原则。

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人民权力才是至高无上的。在共产主义社会中，人民利益高于一切，实现人民专政，人民才是自己命运的主人，才是人类命运的主人。在文化领域，人民群众道法自然，服从真理，人民、圣人、人民领袖，在精神上是相通的。在经济领域，人民群众有劳动、人格、尊严，自食其力，劳有所得，做到公平、公道、公正。在政治领域上，人民群众独立自主，坚守道义，不受欺压，也不欺压别人，邪恶势力都被消除。在社会领域，人民群众和睦相处、安居乐业，幸福快乐、健康长寿。

在共产主义社会中，没有统治者，只有人民领袖；没有官僚政客，只有人民公仆。共产主义的太平盛世的到来，并不意味着人类不再需要国家、政府和暴力，并不意味着处于无政府主义状态，那是缺乏人民觉悟的根本表现。相反地，人民必须把国家权力牢牢控制在自己手里，就是永远坚持追求真理的自我革命，始终保持对邪恶专政的人民权威。

人民权力是需要表达的，人民表达权力是天经地义的。民主是一个好东西，人民表达权力是很不容易的。恩格斯曾经指出：“在 1847 年，社会主义意味着资产阶级运动，共产主义

则意味着工人的运动。当时，社会主义，至少在大陆方面，是可以进出沙龙的，而共产主义却恰恰相反。”为什么资产阶级政府能够接受社会主义，而不能接受共产主义呢？因为社会主义本身理论不彻底，可以欺骗忽悠人民群众。至今为止，除理论彻底的共产主义革命以外，一切邪恶势力都是不甘心失败，不愿意让人民知晓真理、独立自主，总是企图阻挡人民表达自己的权力。在一切非人民性质的国家政权里，统治者都不会真正给予人民表达自身权力的自由，这就是历史与现实。

只有共产主义，人民才能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权力。只有真正为人民奋斗的共产党人，大公无私，一切依靠群众、一切相信群众、一切为了群众，才能让人民表达自己的权力。事实上，人民的权力是自身所有的，只是被贪腐邪恶势力据为己有，变成了它们的私有特权。换句话说，在一切非人民性质的国家里，人民权力的得来并不是天经地义的，它是通过真正有觉悟的人民领袖，比如共产党人带领人民大众坚持长期斗争，通过流血牺牲从邪恶势力手中夺回来的。中国广大未觉悟的老百姓手中的权力，是共产党人给的，也就是人民给的。因此，人民群众的权力固然是自己的，但也需要人民群众团结起来，把自己的自然权力从邪恶势力手中夺回来。

毛主席说：“共产党的权力是人民给的。”这句话一般人理解不透。左翼不同意，如果真是人民给的，为什么共产党能够取消人民群众手中的权力呢？为什么一些蜕化变质的领导干部能够欺压人民群众呢？如果权力真是人民给的，那么上级给的权力怎么讲？右翼高兴说，那就请人民出来民主投票，收回被共产党垄断的权力，各派轮流执政共同分肥有多好，反正有人民“看不见的手”把关，也不用对国家、对历史、对群众去负责。其实，共产党人就是人民自己，共产党的权力是共产党人给的，没有老一辈共产党人的流血牺牲，就没有共产党的一切权力。人民的权力绝不能让邪恶势力沾手，否则就是党和人民自取其辱，难免“受二茬罪，吃二遍苦。”

真正觉悟的人民，不是要取消共产党的人民权力，而是要巩固与捍卫人民的权力。有觉悟的人民要及时站起来，教育觉悟更多的人民，团结发动更多的群众，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从极左极右等邪恶势力手中把人民权力夺回来，重新归于我们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党。所谓党内民主，不只是说话民主、投票民主等细枝末节的肤浅表达，而是道义民主、革命民主，是一种人民权力的彻底表达。只有把极左极右等邪恶势力铲除，才能真正坚持共产党的领导，也就是人民自己的领导。

当人民群众没有觉悟到自身权力的时候，人民就需要圣人作代言人，群众就需要领袖来率领，就需要觉悟起来的共产党人或其它先进性质的组织来领导。换句话说，共产党对人民

群众的领导，就是人民实现对自身的领导，也就是共产党实现对自身的领导。因此，党要管党，就是全党同志要团结起来，共同与邪恶势力作斗争；关键在党，就是关键在于人民自己，真正服从真理，服务人民，就是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就是坚持人民自己的领导。

事实证明，共产党人一旦脱离人民群众，共产党和老百姓手中的权力就会立即丧失。这说明什么呢？共产党人就是人民中一员，觉悟起来的人民就是真正的共产党人。真正的共产党人与人民不可分，真正的共产党与人民群众不能分。脱离人民群众的共产党人，就不再是真正的共产党人，只是普通的群众。违背人民群众利益的共产党人，就不再是真正的共产党人，而是蜕化变质的邪恶力量。人民、群众、全党同志要切实行动起来拯救党，也就是拯救人民、拯救群众、拯救自己。

只有人民自己，才允许人民表达自己的权力。邪恶势力不是人民中的一员，当然不会允许人民表达自己的权力。只有坚持共产党的领导，人民群众才有主心骨；只有坚持人民革命，人民群众才能翻身作自己的主人。光有共产党还不行，还必须有共产主义思想，有共产主义思想武装起来、不惜牺牲的人民解放军，有真正觉悟的大公无私、英勇无畏、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的共产党人。

因此，只有人民民主才是真正的民主，只有共产主义才能实现真正的民主。除此之外，其它任何社会的民主形式都是虚伪的，包括社会主义的国家主义、精英主义。当前问题在于，要使共产主义具有自然真实性，就要让人民群众明白，共产主义现实可行。“共产主义渺茫论”、“社会主义长期论、阶段论”都是错误的。正是迷信“社会主义长期论、阶段论”，比社会主义更高级的共产主义，就成为一个遥不可及的空中楼阁，成为一种梦想中的太虚幻境。不搞社会主义的精英政治、特权腐败，就不能实现社会公平公道公正吗？纯粹是毫无道理的打胡乱说，根本原因在于传统的共产主义理论不彻底，人们不知道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应该是什么，只能隔着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历史现实瞎猜。因此，坚持真理一定要旗帜鲜明，尽管革命领袖们也曾经赞成过“社会主义长期论、阶段论”，但这个错误认识必须加以纠正过来，必须坚决反对加以彻底清算。只有使科学发展观理论彻底化，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人民的信仰与党的出路问题，而不是用任何社会主义理论来欺骗人民、忽悠群众。

六 关心政治

——虚置的人民概念，妖魔的思想牢笼

当今世界，共产主义的人民概念，往往与公民、国民概念一起混用。实际上，人民是守

中的共产主义概念、公民是极右的资本主义概念、国民是极左的社会主义概念，人民被妖魔化、被代替、被代表、被虚置已经很久了。改革开放之初，一些出版社、文化单位争相改名，只为去掉“人民”二字，文艺界的知识分子、极右派成为走向人民对立面的邪恶急先锋。婊子无情，戏子无义，极右派让人最瞧不起。这种轻率的背叛行为，与当初轻率的崇拜行为一样，表明极右派认识是很浅薄的，革命是投机的，立场是动摇的，“小小寰球，有几个苍蝇碰壁。嗡嗡叫，几声凄厉，几声抽泣。”食腐逐臭，名利之徒耳。毛主席说：“要文斗，不要武斗”。对于人民群众的思想问题，依靠武力不能根本解决问题，摆事实，讲道理是必要的。

当前，人民群众面临有两大困境：一是思想乱了，二是政权丢了。人民群众着了极右派的圈套，被关进了老虎笼子里。认识错误混乱、言行虚伪怯懦，这是未觉悟的群众；不能解放自我、失去革命意志，这是不合格的人民。人民群众被私有财产异化了，思想被胡说八道迷惑了，迷失了本性，失去了自我，为满足一己私利私欲，走上人民群众自己反对自己的邪路。人民的意志被极右派代表了，人民的权力被极右派剥夺了，人民群众失去了话语权，变成沉默的羔羊，沦为弱势群体，成为妖魔鬼怪争抢的唐僧肉。工人、农民、学者被看成傻瓜，或者学坏人去骗人，官僚、资本家、汉奸、买办、骗子、极右派成为大能人，成为全社会的成功榜样。道义是非被彻底颠倒了。失去道义是非标准的人民群众，大部分成为受害者，少部分成了邪恶势力及帮凶。

有人说“人民打倒了毛泽东”，这话不妥。人民只是抛弃了毛泽东思想，没有打倒毛泽东。《西游记》说得对，是唐三藏肉眼凡胎，同情坏人，抛弃了天生圣人孙悟空。善良的老百姓，与唐僧一样不识好歹，分不清好人坏人，昧着惺惺使糊涂。一些人发泄私愤，为极右小丑的上窜下跳鼓掌喝彩，非毛又反共，比如《炎黄春秋》。一些人见利忘义，为汉奸买办推广有毒疫苗、转基因主粮鼓吹张目，损人终害己，比如《南方周末》。长期以来，正是人民群众对毛泽东思想不理解、不认同，客观上纵容了“反毛、非毛”的极右泛滥。

现在流行“屁民”，中国很久没有人民了，人民也闹不清自己是谁。现实紧迫的问题是，谁来告诉人民真相？用什么来教育人民、重建人民信仰呢？极右派总是打胡乱说，公开背叛人民，阴险奸诈蒙骗大众，化公为私完成原始积累，为非作歹。极左派老是背诵教条，犯着“左派幼稚病”，深陷教条难以自拔，在错误观念里胡乱争论，清谈误国。因此，只有自然守中，才能反对极左极右；只有科学发展观，才能解放人民的思想；只有共产主义，才能实现人民的复归；只有坚持天下道义，才能解放全人类。

进一步解放思想，与传统的错误观念实行最彻底决裂，就是共产主义革命者的首要任务。

要把人民从话语牢笼中解放出来，使之具有“真人、好人、自然人”的本质规定性。只有这样的人民概念，才能代表着真实的人民本身。如果人民不具有真人的文化属性、不具有好人的政治属性、不具有自然人的本体属性，离开“真人、好人、自然人”的本质规定性，人民就会迷失自我丧失主体，成为混乱的现实人或抽象的虚拟人概念。混乱的或抽象的人民概念，就会被邪恶势力利用做成神龛牢笼，用甜言蜜语糖衣炮弹加顶礼膜拜，把人民高高地供在圣坛上。人民概念失去了自身的真实内容，成为没有利益、没有欲求、神圣无比、不食人间烟火的上方天尊，人民的切身利益和正当权利反而成了牺牲品，就被挂着“人民”招牌的贪官污吏、大小鼠辈们肆意瓜分、垄断享用。

人民神圣？还是人民自然？事实上，人民本身具有自然真实性，并不天然具有神圣性。只有为天下道义勇于牺牲，只有敢于同邪恶作斗争，人民才具有神圣性。因此，“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只有这样的人民，只有为天下道义奋斗牺牲，才具有神圣性。不是人民神圣不可侵犯，而是天下道义神圣不可侵犯。人民以服从天下道义为天职，人民军队以解放人民为使命，天下道义就落实在人民革命的行动中。正所谓“道之所在，义之所在；义之所在，天下赴之。”

毛主席说：“老百姓要关心政治，要关心国家大事”。一些老百姓说：“我不关心政治，我只是个普通人，我只在意过好自己的小日子。”这是连做人觉悟都没有的愚昧思想。那么，老百姓究竟要不要关心政治呢？有个网友这样写道：

我以前不关心政治，是因为我知道，政治就其实质就是一种某些阶层利用其来达到自己目的的手段和工具；政治的本质就是利用和斗争，它是黑暗和血腥的，而中国的政治则更是如此。人生短暂，何必硬去探究政治到底黑暗和血腥到什么地步而使自己的生活乌云密布呢？虽然我也知道，没有人能离开政治黑手的掌控，但是，别人能忍受，为什么我就不可以？

我的想法发生改变是我有了女儿之后。当看着那个美丽纯洁的生命从巨痛和血污中降生，当她柔弱的小手握紧我的手指，当我的世界成为她的世界，当我成为她全部的信赖，我开始思考，我该为她做些什么。

是的，总有一天，我们会离开这个世界，那时候，这个世界的一切与我们无关。但是，我们的孩子是在的，我们愿意留给她一个怎样的世界？冰冷的还是温暖的？黑暗的还是光明的？专政的还是民主的？混乱的还是和平的？颠倒的还是和谐的？

无数事实证明，那些操纵着政治工具的既得利益集团是不可能主动放弃利益的，那么，我们要平等、进步、发展、富裕、和谐等等，都必须经过我们艰苦的斗争，如果今天我们不争取，今后，我们的孩子会为此付出更大的代价。而在中国现阶段，幼稚的政治和治国

方针是我们实现愿望的阻碍。或许我们的认识也不一定全部正确，但是只要我们开始越来越多地发出我们的声音，越来越多地参与我们自己的政治，或许，我们的政治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成熟。只有每一个人都开始表达自己的愿望和追求，只有每一个人的合理愿望和追求都得到尊重和保护，我们的社会才可能真正进步，我们的未来才可能真正光明和充满希望！

即使老百姓不关心政治，政治也会降临在老百姓身上，大多数人成为政治的受害者。当代中国的改革开放，由于理论滞后的原因，党和人民在政治与文化上陷入妖魔化的认识误区，社会正处在不可持续的危险之中。树欲静而风不止，帝国主义反共反华之心不死。当前，极右派打着“民主自由”旗号向党要权夺权、打着“国退民进”旗号大搞私有复辟、打着“人性本恶”旗号胡说八道为妖魔壮胆，这样的邪恶行径不胜枚举。极右派不惜公然与党和人民为敌，在美帝国主义等反共反华邪恶势力支持下，向着人民的国家政权发动疯狂进攻，全体有觉悟的共产党人、人民群众除了奋起反抗之外，已经没有退路；国内外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相互勾结，一旦颜色革命复辟成功，就会变成资产阶级专政，人民政权就会彻底蜕变成邪恶政权，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就会卷土重来，人民群众就会重新被压在三座大山之下，就要亡党亡国，中华民族就要亡族灭种。面对如此深重灾难的祖国，试问，人民群众能不关心政治吗？

社会政治意味着斗争，但不意味着黑暗。服从天下道义，为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去奋斗，就是光明的王道政治，只有邪恶势力才感觉那是黑暗。真正的共产党人，要为实现人民幸福的政治目标去奋斗，消灭邪恶的旧政治、旧经济、旧文化的统治，建立光明的新政治、新经济、新文化的统治，就一定能够建成新社会、新国家、共产主义的人民新世界。